

第七章 商业科技

商业科学技术工作,涉及加工生产、商品流通和饮食服务3个领域。它的主要任务是:改进技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提高商品

使用价值,降低商品成本;改进商品养护,降低商品损耗;开发新产品,发展综合利用;改善卫生条件,防止污染,保障人民健康。

第一节 发展概况

50年代初期,四川商业科技处于空白状态。从1953年开始,逐步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主要是:增添设施,改善仓储条件,加强商品养护,避免潮湿、霉烂和滴漏损失;改进运输装载技术,提高商品装载量,节约运输费用;改善加工生产条件,提高生产率,增加商品产量。

1958年,全省商业职工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号召,成立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三结合小组,针对商品流通和加工生产中的薄

弱环节,提合理化建议,采取仿制改制办法,对部分加工生产、仓储保管、饮食服务的工具进行改造,对推动技术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有的项目贪新求全,并不实用,有些项目还不成熟,未经科学鉴定就盲目推广,造成浪费。1960年5月,全国举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操作表演大会后,四川各地商业部门对革新改造项目进行了鉴定、定型和推广应用工作。但是,在这以后的几年,由于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商业科技逐步停顿下来。到

1964年前后,才开始恢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业科技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科技机构被取消,科研工作完全停顿。1975年,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科技会议后,省商业厅建立科技机构,配备人员,制定10年科研规划,省计委和省科委也拨给科研3项经费,重新恢复了商业科研工作。但是,研究成果较少。

1978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系统科技会议后,省商业厅召开会议,传达这两个会议的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提出科研规划,安排经费,落实措施,使商业科研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酒类、酿造调味品、肉类加工、商品养护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科研成果。

第二节 科研项目与经费安排

从1975年起,商业部、省科委、省计经委在安排商业科研项目的同时,拨给科研经费,支持商业科技的发展。1975~1988年,省商业厅系统共安排科研项目162个,拨给资金522.09万元。其中:商业部安排的项目33个,拨给资金82.6万元;省科委安排的项目39个,拨资金82.3万元;省计经委安排的项目16个,拨资金292.5万元;省商业厅安排项目74个,拨资金64.69万元。商业部安排的项目,主要是支持酿酒、酿造调味品,糖果糕点、沼气利用、包装、商品养护、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科研;省科委安排的项目,重点支持蔬菜、酿酒、酿造调味品、肉类加工、商品零售和商品检测等方面的科研;省计经委安排的项目,主要支持商办工业方面的科研和新产品的开发;商业厅安排的项目,主要是酒类、酿造调味品、糖果糕点、成型煤加工、蔬菜等方面的科研工作。由于各方面大力支持,并得到有关科研单位的支援配合,商业科研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提高质量,节约原料,降低费用,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

第三节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1975年以前,推广应用的主要是一部分生产工艺,生产设施和工具,1975

年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了一些重大科研成果,使科学科技尽快转化

为生产力。

酿酒。酒类生产技术,过去均由酒师掌握,密不传授。1955年以后,省酒类专卖公司通过总结经验,组织观摩学习,推广了蒸晾料、撒曲、发酵和快速培窖等先进的生产技术。1955年,将白酒生产的混底晾堂,改为砖底晾堂。1957年,推广红粮酿酒的“匀透适、闷水操作法”,包谷酿酒的“泡闷蒸连续操作,缓火升温,两次泡粮,高温撒曲,低温进箱”,大曲酒“低温发酵,减糖减水,滴窖加回,回沙发酵”等先进生产工艺。1958年,将曲酒发酵从30天改为40~60天,提高了曲酒醇香度。同时,使用快速培窖,将原20年时间才能老熟的酒窖,缩短为只需10年左右。推广应用这些先进生产工艺和经验,对提高产酒率,提高曲酒质量,提高酒窖利用率,扩大生产,均起到很好的效果。1982年后,相继推广了气相色谱指导勾兑、浓香型曲酒生产新工艺、人工培育新窖老熟、微机勾兑等科技成果,对提高出酒率,提高大曲酒优质品率,扩大生产,节约粮食,降低成本,增加利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4年,推广应用低度酒生产工艺,先后投入生产的有:宜宾五粮液酒厂的39度五粮液,泸州曲酒厂的38度泸州老窖特曲,绵竹剑南春酒厂的38度剑南春,永川酒厂的38度露华浓酒,增加了品种花色,开拓了国内、国际市场。

肉类加工、生化制药、生猪饲养、防治疫病等方面。50年代末期,重庆肉联厂仿制磨刀电棒,在全省食品系统屠宰场、肉店推广应用,改变了过去用磨石的老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后,陆续推广了屠宰生猪流水生产线、分割猪肉生产工艺、冻猪肉和香肠等零售定额保鲜包装、离子交换法生产肝素纳、人工牛黄以及生猪六号病高免血清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酿造调味品。渝3·811酱油曲霉菌种,是重庆市酿造公司酿造调味品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从一个有40多年厂史的老酱园土墙泥土中获取的菌源样品,经过反复分离、筛选,培育出一株菌种,获得成功。1981年通过鉴定,列为四川省1982~1983年重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由省蔬菜公司负责组织实施。至1984年,已在省内93个酿造厂推广应用,占全省197个酿造厂的47.2%;省外有27个省、市、自治区的317个酿造厂推广应用。从省内推广应用的21个厂抽样检查,原料蛋白利用率由推广前的58.9%提高到71.03%,增加12.13个百分点,比全国普查平均水平65%高6.03个百分点;新增产量3.5万吨,新增产值1000多万元,新增利润390万元,节约粮食1840吨。在酿造调味品行业,还推广了酱油原料高压连续螺旋蒸煮机,固态低盐酿造酱油工艺,机制豆豉生产工艺等科研成果,都取得了显著

效果。

在糖果糕点和其它方面,还推广了桃片切片机、薯芋综合利用、巧克力系列产品工艺、沼气利用、锅炉消烟除尘等,都有较好的效果。

仓储运输方面,1963年推广重庆市商品养护研究成果,交流了食糖、卷烟、百货、针棉织品、五金、蔬菜等商品

保管养护经验,以及简易密封隔潮库房、磷化锌灭鼠经验,改善和提高了全省商品养护,减少了商品霉烂变质、残损损失。推广蓬溪、射洪用货架堆码、分类储存商品的经验,提高仓库利用率20~30%。1984年,推广鲜蛋笼屉式多用塑料蛋箱、南菜北运蔬菜包装,减少运输损失10%。

第四节 对科技成果的表彰与奖励

表扬奖励成绩优秀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人员,是推动科技工作的重要措施。50~70年代初期,对取得优秀成绩的人员,主要是进行精神鼓励,如通报表扬、评为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并适当给予物质奖励,如发给日用品或奖金。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各级领导部门对奖励科技成果更加重视,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奖励的规格,有国家级,有部级,有省级,有厅级(有些市、县还有奖励)。除奖牌、奖状外,更加重视物质奖励,按获奖等级分别发给奖金、晋升工资等,对推动科技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四川省商业科技成果“薯芋资源调查和薯芋综合利用的研究”获奖;在四川省科学大会上“屠宰生猪钢绳流水线的研究”等20个项目获奖,其中,“人工

培育新窖老熟的试验”等6个项目获三等奖;“猪六号病高免血清研究”等5个项目获四等奖。

1980年度,“酱油原料高压连续螺旋蒸料机”等3个项目,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JSK-1型仓库测控仪”等2个项目获四等奖。

1982年9月,商业部对1978~1980年的商业科技成果进行了奖励。省商业厅系统获奖的科技成果5个项目,其中:“渝3·811酱油曲霉菌种”获三等奖,还有4项获四等奖。同年,“机制豆豉”生产工艺设备等3个项目,获四川省1981年度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桃片切片机”等4个项目获四等奖。

1984年7月,省商业厅制发《四川省商业系统科学技术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同年8月,对1978~1984年的商业科技成果55个项目进行了奖励,

其中,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16 项,四等奖 18 项。1987 年,省商业厅对 1985 至 1986 年的科技成果进

行了奖励,获奖的 14 个项目中,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7 项,四等奖 5 项。

第四篇

市 场

四川经济开发较早,古代的巴蜀已有定期的集市交易。秦汉时期,巴蜀工商业发展,成都、重庆已成为货物集散市场,唐宋时期,成都是全国最繁荣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成都、重庆、宜宾、泸州、万县、乐山、内江、南充、遂宁等地都先后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商业贸易市场。重庆地处川江要冲,既是省内和西南地区贸易的枢纽,又是与长江中下游贸易的咽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四川大约有3000个场镇市场,构成了遍及全川的市场网络。但是,大多数城乡市场,仍然是“以有易无”,调剂余缺的场所,与省外商品交流规模不大,市场还是封闭性的。

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重庆、万县相继设埠开关,四川成为列强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的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光绪、宣统年间,场镇市场发展到约4000个。以洋货输入和土货输出为标志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四川商业从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化,大宗贸易为外国洋行和官僚买办所控制,重庆、万县等沿江城市成为新兴的外贸口岸。与此同时,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省内商品市场渐趋活跃。军阀混战,防区割据时期,市场受到摧残和窒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大后方,沦陷区大批工商企业迁川,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繁荣的四川市场又趋衰落。1949年12月,全省尚有场镇市场4700多个。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6年完成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了以国营、供销合作商业为主体的统一市场,农村集市贸易范围日趋缩小,并曾一度关

闭。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城乡市场数量增多,规模扩大,面貌日新月异。1988年底,全省有城乡市场7045个,其中城市677个,农村6368个。本篇着重记述规模较大,有经营特色的成都、重庆、万县、涪陵、达县、泸州、宜宾、乐山、雅安、绵阳、广元、南充、遂宁、内江、自贡、攀枝花等16个市场。

这16个市场或因地理条件优越,或因资源物产丰富,除攀枝花外,市镇出现和发展较早,为历代政府郡、府、州、县的治所。它们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是传统的农副产品集散市场,有的是工业品产销市场,有的是进出川物资中转市场,有的则是几种功能兼而有之。宜宾、泸州、涪陵、万县、达县、广元、分别是滇东北、黔西北、湘西、鄂西、川东北、陕南、甘、青及附近县的山货、桐油、药材、粮油等大宗商品的集散市场。自贡、内江、南充、乐山、遂宁、雅安分别为食盐、食糖、丝绸、花纱布匹、茶叶等大宗商品的产销地。攀枝花、绵阳则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省会成都历来是省内商品集散中心。重庆则为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的贸

易中心。这些市场共同的特点是,都居于水陆交通要冲,有的还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宜宾、泸州、重庆、涪陵、万县位于长江沿岸,成为与长江中下游、滇黔两省贸易的枢纽;自贡、内江、乐山、绵阳、遂宁、广元、南充分别位于沱江、岷江、涪江、嘉陵江沿岸,成为川南、川北与南北各省通商的要津;雅安位于青衣江畔,是川藏往来必经之地;达县位于渠江支流州河之畔,为川东北门户。在现代交通工具未发展前,主要依靠水路运输与外界贸易往来、集散物资。解放后,成渝、宝成、成昆、川黔、襄渝等铁路干线和大量公路相继建成,以及航空线的开辟,逐步形成水陆交通网络,使用现代交通工具运输货物,促进了与省内外、国内外商品交流。

随着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四川的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综合性、专业性的市场不断出现。交易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除经常性的大中小型物资交流会、供货会外,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乐山的国际龙舟节、广元的女儿节、南充的丝绸节、泸州的酒文化节等均为广阔的物资交易市场,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章 四川省会——成都市场

成都是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公元前4世纪,古蜀国开明王朝在此建都。蜀汉、前蜀、后蜀等,均以成都为都城立国称帝。由秦至清,成都为蜀郡、益州、剑南道、益州路、成都府、四川省治所。民国17年(1928年),设成都市,为四川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驻地。1952年恢复四川省,仍为省会。1983年,原温江地区并入成都市。1988年全市辖5区、1市、11县,总面积

12618平方公里,人口898.56万。市区面积1389平方公里,人口273.65万。

成都已发展成为西南交通的枢纽。铁路有成渝、宝成、成昆3条干线在此交汇,连接全国各地。公路四通八达,有省级以上8条,市级39条。民航,有50多条航线通往全国各大城市和直航香港。1988年,客运量9782万人次,货运量7425万吨。邮电通讯是全国六大通讯交换中心之一。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成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有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农副产品十分丰富,历来就是农副产品集散地。秦汉时代,在成都交换的大宗农副产品有药材、茶叶、蚕丝、皮毛、

竹器、杉板等。在唐代,成都为全国七大重要产茶地之一。民国时期,茶叶年销量达1.5至2万担,远销东北、西北、华北。药材在抗日战争时期销量增长很大,同抗战前相比:年销川药由

17 万多市斤增至 90 万市斤；砂仁、大香、草果由 3 万多市斤增至 28 万市斤；鹿茸由几十对增至 600 对。1949 年，猪鬃年销 3000 担，比抗战前增加一倍半。鸭毛、兔皮年销量也达到 1500 担和 130 万张。内江、资中一带所产的食糖，经成都转销西北各地，常年在 3000 万市斤以上。其他晒菸、花生、芝麻、竹器等农副土特产品，汇集成都销往省内外的也不少。

50 年代开始，农业、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猪肉、蔬菜、水果产量猛增。1988 年，畜牧业总产值 8.16 亿元、猪牛羊肉总产量 34.27 万吨，水果总产值 7.94 万吨，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13 倍、21 倍、7.6 倍。蔬菜总产值 232.42 万吨，比 1981 年增长 15 倍。据全国 25 个大中城市的统计资料显示：成都的牧业总产值占第四位，猪肉产量占第二位，水果产量占第七位，蔬菜产量占第三位。随着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商品量的增加，流通体制的变化，特别是 1984 年市政府提出敞开城门，搞活流通以后，成都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加强，购销量进一步扩大，销往全国各地的商品日益增多。其中，生猪来自邻近几十个市县，加工销

售到全国十几个省市。1988 年，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收购农副产品 13.52 亿元，比 1978 年增加 1.5 倍。其中，国营商业调出市外、省外猪肉 5.7 万多吨，占当年购进总量的 40%。调省外蔬菜 15 万多吨，约占全国南菜北调的 1/3 左右。外贸收购农副产品 2.85 亿元，比 1979 年增长 4.5 倍。

城乡集市贸易，历来是农副产品的的重要流通渠道。成都的集市贸易自古十分兴旺，至今还有许多以市命名的街道，如骡马市、牛市口、羊市街、鹅市巷、杀猪巷、草市街、棉花街、糠市街等。1979 年后，集市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83 年后，随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贩运活动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批以批发为主的批发市场，如荷花池综合市场（药材、水果等），宏济路腌卤市场，九眼桥水产品批发市场，新都县的粮食批发市场，崇庆县怀远镇的竹编、草编、藤编市场等。1988 年，全市有交易市场 511 个，全年成交额 24.86 亿元，相当于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30.3%。市场面积也由 1978 年的 22.4 万 m²，扩大到 180 万 m²，增加了 7 倍。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成都的手工业产品，历史久远，早

负盛名，煮盐、冶铁、织锦、漆器、陶瓷、

麻纸等产品享誉国内外。据史料记载：汉代，临邛铁器为东南亚、南亚诸国所喜爱，并远销罗马。成都漆器，远销江汉、滇黔、蒙古和朝鲜。蜀汉时期，成都是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产区，是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源。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唐宋时期，广都（今双流）麻纸，为官府文书所采用。蜀瓷以“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所重”。宋神宗时，在成都建立锦院，募军匠 500 人织造，专供皇室使用。历史上以手工业品命名的街巷也不少，如金丝街、银丝街、打金街、打铜街、纱帽街、暑袜街、染靛街、布袋巷、丝棉街等。清末，成都的日用品行帮已达 31 个。民国 26 年，有日用工业品店铺 2652 家，当年销售丝绸 15.5 万匹，布 20 万匹，夏布 83 万匹，夹江土纸 200 万张，元钉 1 万桶，各种染料 1600 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美国货充斥市场，成都不少企业倒闭，仅丝绸、呢绒、织布业就由 300 多家减至 101 家。

50 年代开始，成都发展建设成为新兴工业城市。成都是“一五”计划期间，全国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布局地区之一。从“三五”计划开始，国家把成都列为三线建设的重点，进行了大量投资。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更快。1988 年，已形成以机械、电子、冶金、化工、食品、轻纺工业为主的 14 个门类、100 多个行业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其中，轻

纺工业已有 110 个企业，16 万多职工，年总产值 23.3 亿元。年产各种布 10107 万米，针织内衣 1564 万件，床单 161 万条，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82 万台，塑料制品 3.12 万吨，机制纸 11.44 万吨，服装 2241 万件。

成都的食品工业，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成包括粮食、菜油、酿酒、糖果、糕点、肉食、制茶、卷烟、调味品等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食品工业体系。1988 年，全市共有食品工业企业 1323 个，产值 1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2 倍。特别是曲酒、肉制品、调味品，品质优良，行銷全国。成都全兴大曲三届蝉联国家名酒，获金奖。获商业部、农牧渔业部优质酒称号的有文君酒、二峨特曲等 30 个品种。1988 年，全市饮料酒类产量 9.61 万吨，比 1978 年增长 6.5 倍，其中年产 4.4 万吨曲酒，约一半左右销往省外。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的还有糖果类 9 个，糕点类 3 个，肉制品 4 个，粮酿制品类 6 个。

随着工业生产发展，商业购销不断扩大。1988 年，全市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购进工业品总值 52.1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1 倍。在 34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煤炭外，都有调出。其中，元钉、铁丝、胶鞋、洗涤用品等，市外销售占一半以上。全市工业自销额达 9.07 亿元，占国营商业总销售的 1/3。外贸出口的工业品从无到有，达

到 1.9 亿元。

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工业品流通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改统购包销为订购、经销、选购、代销,多渠道流通格局形成;二是 1984 年省属二级站下放后,实行二级批发、三级批发与零售合一,并大力发展零售;三是发展形式多种多样的工商联合、商商联合、跨地区联合;四是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大型零售商场。1988 年,全市有工业品

批发企业达 477 个,从业人员 12680 人,零售企业 4199 个,从业人员 35486 人。市一商局系统的市属企业同省内外 5000 多家工商企业建立了购销关系,企业自购货源由过去 30% 上升到 70%。10 年中新增营业设施面积 16 万平方米。1988 年直接向工厂进货 16 亿多元,占当年购进总额的 65.5%。

第三节 饮食服务业的发展

成都的饮食业,是全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的主要基地,久负盛名。成都近年出土的东汉文物中,有酿酒图砖和饮宴图砖。西汉年间,有才女卓文君开店卖酒——“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佳话。唐代诗人张籍在《成都曲》中记叙有“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的盛况。经过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川菜得以发展提高。名菜、名餐馆相继问世。成都的小吃,经过恢复、发展、交流、提高,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举办风味小吃展销、鉴定、评比、命名等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参展的名小吃品种有 150 多个。商业部、四川省商业厅分别在成都兴办烹饪专科学校和成都市饮食技工学校,培养了大批厨师。川菜出省、出国,名小吃外销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仅赖汤

元、郭汤元心子年外销量即多达 150 多万斤。先后有 150 多名川菜厨师劳务输出到十几个国家。有 250 余人被派到外省合办川菜馆或提供技术劳务服务。成都的旅馆业,1985 年开始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各行各业,市内市外“三个一起上”,使市区旅馆床位三年翻了一番,达到 13 万多个,基本上解决了旅客住店难的问题。摄影业、理发业、洗染业也有很大发展。1988 年,全市共有饮食服务网点 53334 个,从业人员 130054 人,比 1979 年增加 10 倍和 1.8 倍。市区每万人拥有饮食服务网点在全国 25 个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

成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全市共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7 处,其中:国家级 4 处、省级 19 处、市级 94 处。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区,198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景点之一。杜甫草堂、武侯祠中外驰名。1988年接待国

外旅游者11.11万人,创汇6872万元外汇人民币。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开发最早的地区,是川西农产品手工业品集散市场。早在春秋时代,成都就与秦国有通商往来。战国时,煮盐、冶铁已具规模。秦汉时,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通缅甸、印度的通商古道已开通。蜀布、漆器、丝绸等行销国内外。成都以盛产锦绣而号称“锦城”。魏晋南北朝时,长期战乱,经济衰退。唐代“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是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和繁荣的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称。两宋时期,织锦、制茶、印刷等业进一步发展,商业兴盛,形成了定期交易市场,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冬月梅市、腊月桃符市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真宗年间诞生于成都。南宋末、明末,成都屡遭战乱破坏,经济衰落。清乾隆、嘉庆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市场日趋繁荣。1891年重庆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四川的商品输出,成都市场商品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20世纪初,商务局定期于每年二月在

成都青羊宫举办劝业会,以促进商品交流。新建劝业场(后称商业场)于宣统元年开业;宣统二年全年交易额达银46万两。成都市场行销的洋货有:洋纱、洋布、匹头、毛纺织品、五金制品、染料、药品、化妆器、火柴、肥皂、皮革等。输出的土货主要有:生丝、茶叶、中药材、猪鬃、鸭毛、沙金、牛羊皮、草帽、苎麻、兔皮等。专门经销洋货和收购土货的大商号有:公泰字号(西东大街)、从仁祥号(科甲巷)、光裕厚号(总府街)、正大裕号(暑袜街)、大有征号(总府街)等。据《成都通览》记载:宣统年间成都有商帮69个,商号4000余家。据1934年《四川月报》统计:成都100余个行业有商号店铺17000余家。春熙路、商业场、安乐寺成为商贸大市场,百货荟萃,买卖兴隆,有店铺470余家。民国25年,成都商业人员(包括饮食服务业)已达11.4万人。抗日战争时期,省外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迁川,兴办和扩建了一批大中型商业企业,如中国国货公司、宝元通(蓉)股份有限公司、福泰和股份有限公司、聚福祥、恒益升等。抗战中期成都100

余个商行有商店 28480 家。1946 年从事商业饮服务业的人员 14.9 万人。此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社会经济陷入危机。解放前夕,工商业奄奄一息,频于崩溃。

解放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成都的商业发展较快,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1987 年,成都市商业部门实现的总值中,净输出率为 57.6%,已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商品集散大市场之一。1988 年,全市商业机构 17.38 万个,从业人员 44.22 万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82.07 亿元,集市贸易成交额 24.86 亿元,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8 倍、1.7 倍、4 倍、8 倍。

成都市市场以丰富的副食品,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饮食服务业,众多的旅游点,为承办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商品物资交流会创造了条件。1987 年,成都首次承办了有七八万人参加的全国糖酒及三类小食品交易会,并被商业

部定为全国三个交易会址之一。上万人、数千人的五金、百货、针纺、药材、物资等中型交易会,每年也有几次在成都召开。全国性的各种类工作会、交流会更是频繁。所有这些,对成都市的商品生产、流通和社会服务事业都是有力的促进。

成都与国外、国内的经济协作也有一定发展。截至 1988 年,先后与法国的蒙彼利埃市、奥地利的林茨市、日本的甲府市、美国的菲尼克斯市、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市等结为友好城市。与外商合资联营企业 49 家,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合同 242 个。同时,成都还在深圳、珠海、福州、厦门、东莞等沿海城市建立了窗口企业 80 多家。

成都已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心城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成都正朝着建成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城市的方向发展。

第二章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市场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境内山峦起伏,素以“山城”著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水陆交通便利,使重庆在近代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南的物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古重庆,为巴人聚居区,秦置巴郡。隋唐、宋置渝州。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置为重庆府。元为四川行省九路之一。明初复改为重庆府,直至清末。民国18年建市。民国26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定为战时首都。民国28年5月,改为行政院直辖市。民国29年定为陪都。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后,为中央直辖市,是西南区党政机关驻地。1954年,大区撤销,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1978

年辟为开放城市,1980年又定为对外贸易港口。1983年4月,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将原永川地区并入重庆,为享有相当省的经济管理权力,实行国家对重庆市计划单列。全市辖9区12县,面积23114平方公里。1988年末总人口1460万,其中城镇人口360万。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陆运有成渝、川黔、襄渝3条铁路干线和11条国道、省道公路干线联通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空运有12条民用航空线直航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市。新建的全天候江北国际机场可直达香港。水运可直航海外。1988年,客运总量1.39亿人次,货运总量2.1亿吨,重庆邮电成为全国六大现代化通讯中心之一。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长江、嘉陵江沿岸及两江的主要支流的主要河段,分布着大小集镇 228 个。川、滇、黔、陕、藏等地农副土特产品,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水系与陆路交通,源源输入重庆,再由重庆输送长江下游地区和国外,辐辏往返,络绎不绝。重庆开埠后,轮船航行川江,扩大了重庆农副产品的转输和出口能力。光绪十七年,重庆农产品出口总值 202.7 万海关两,宣统二年达到 1549 万海关两,20 年间增加 1.7 倍。民国 9 至 13 年,每年输出蚕丝 1.2~1.5 万担,占全省产量的一半。从开埠到民国前,每年由西南、西北地区运销重庆的药材有 5 万多担。民国 19 至 25 年间,每年出口国外猪鬃 1 万担,牛羊皮 2~3 万张,兔皮 50~60 万张,鸭毛 0.6 万担,芋片 1.6 万担。四川畜产公司猪鬃产销量一度占世界猪鬃市场的 70%。重庆集散的农副土特产品的国内贸易也很兴盛。药材主要销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湖北等省;桐油销江、浙等省;夏布主要销河北、山东、两广等地,以北平为主,天津次之;桔糖销宜昌、沙市、汉口一带;山货销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民国 25 年,全市经营农副产品的

有 1000 多家商家。抗日战争时期,长江中下游沦陷、水路运输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贸易线被切断,重庆农副产品集散量骤减。国民政府实行战时商业管制,主要日用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出口物资统购统销,限制市场价格,农副产品市场衰落。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场销旺,有少量出口。

1950 年,西南区贸易部和重庆市人民政府,恢复农副产品市场,沟通内外流通渠道,组织大批粮、肉、菜、糖、盐供应人民需要。猪鬃、皮张、羽毛、茶叶、麻、生漆等传统商品恢复出口。国营商业、供销社各专业公司经营的农副产品购销额逐年扩大。1985 年,粮、猪、禽蛋、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大宗农副产品取消统购派购,改为合同订购、议购议销,自由购销,购销量进一步扩大。1988 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 29.8 亿元。主要农副产品购销量:粮食,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60 万吨。1988 年,收购 83 万吨,调入 65 万吨,调出 3 万吨,销售 156 万吨。生猪,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135 万头。1988 年,收购 369 万头,调入 71 万头,调出 146 万头,销售 259.6 万头。干鲜菜,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25 万吨,调入 2 万吨。1988 年,收

购 39.5 万吨,调入 1 万吨,销售 40 万吨。柑桔,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2 万吨。1988 年,收购 6 万吨,销售 5.5 万吨。酒,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3 万吨。1988 年,收购 9.58 万吨,调入 0.25 万吨,调出 0.89 万吨,销售 9.82 万吨。茶叶,1957~1978 年,年均收购约 2200 吨。1988 年,收购 7480 吨,销售 4474 吨。

1988 年,全市有农副产品批发机构 2547 个,人员 10982 人。农副产品出口国外的数量增加,换汇比重减少。1958 年,农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16%,1984 年下降为 12%。1985 年,外贸收购农产品额 3540 万元,换汇 1639 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10%。1988 年,外贸收购农副产品额 9295 万元,换汇 2317 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9%。食品加工业已发展为重庆五大工业支柱之一,农副产品由初级产品集散发展为加工产品销售。全国食品工业有 23 大类,重庆有 21 大类,拥有一些现代化加工企业。1985 年,全市有 2050 个食品加工企业,生产

5000 多种花色品种,75 个产品获优质产品称号,年产值 14 亿元,比 1949 年产值 9084 万元增长 15 倍。1988 年,产值增至 22 亿元,销售 26 亿元。

城乡集市是农副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早在巴国时期,重庆已有集市贸易。明清以后,重庆集市贸易更为兴旺,沿江形成了竹木、山货、药材、棉花等专业市场,成为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1953 年后,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大宗主要农副产品按计划收购,集市贸易日益缩小。“大跃进”期间,对集市贸易一度加以限制。“文化大革命”中,强行关闭。1978 年后,重庆市不断放宽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城乡集市开始出现大发展的势头。1988 年,全市城乡集市发展到 856 个,其中城区市场 179 个,农村集市 677 个。粮食、油脂油料、棉烟麻,肉禽蛋、水产品、蔬菜、干鲜果等七大类商品成交量为 9.6 亿公斤。集市贸易 15 大类商品成交额为 19.1 亿元。人们消费的猪肉,蔬菜的 50% 以上、消费的家禽、鸡蛋、鱼类的 80% 以上,来自集市。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重庆工业品市场兴起于明末清初。清咸丰年间(1851~1861),重庆和遂宁、广安、璧山等地的土布运销云南、贵州,较场口初步形成土布专业市

场,有专业店铺 10 多家。由于土布畅销,滇、黔、湖北沙市、湖南常德的土布以及苏州、杭州等地的日用百货商品(当时称苏广杂货)亦逐渐进入重庆市

场。光绪十七年重庆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英、法、美、日、德、意、印度等国的工业品大量涌入,当年进口额达白银 137 万海关两。宣统三年增至 1900 万两。输入的主要商品有棉纱、棉布、呢绒、煤油、染料、化妆品等。重庆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武汉的洋货销售中心。各种洋货经重庆转销成都、泸州、叙府、嘉定、顺庆、绵州等地及云、贵等省。洋广杂货店铺应运而生,大小水客云集重庆,重庆布匹业增加到 60 家。

民国初年,进出口物资仍靠水路运输,沿江码头,千帆泊岸,年吞吐量约 300 万吨。工业品批发市场在东水门至太平门滨江一带,小商品市场在大梁子一带。民国 25 年,经营纺织品,服装,五金、电料、化工、百货、日用工业品的店铺有 1047 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敌占区一些工商企业内迁重庆,建立了一批大中型的官办和民营商业企业,如中国国货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宝元通公司、华华公司、西大公司等,工业品市场渐趋繁盛。1949 年末,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崩溃,虽尚存经营工业品的店铺 6118 户,但是市场奄奄一息。

1950 年开始,人民政府大力恢复和扶持地方工业品生产,国营西南区一级的工业品批发公司相继建立,积极收购地方工业产品,并统一向省外采购工业品,按供应区划,直供云、贵、

川、西康等省,与省外上千个企业建立了贸易关系。1956 年后,主要工业品实行计划分配,流通渠道单一。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商品购销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分配调拨改为自组货源,产销挂钩,跨地区进货等多渠道、多形式,大多数产品由工商、商商之间自由购销,或工商、商商联营,并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经营。1984 年初,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建立,实行开放式经营,促进了工业品批发体制的改革。1988 年底,全市有国营百货、纺织、针织服装、五金、交电、化工、石油、煤建批发站(市公司)和工业品贸易中心等 9 个大型批发企业,各类工业品批发机构共有 841 个,职工 16847 人。工厂直销门市部 8637 个,人员 19005 人。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个体经营者。商业繁华地区集中在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两路口、观音桥、杨家坪、沙坪坝、南坪和朝天门等地。这些街道商店鳞次栉比,顾客川流不息,交易频繁。改建后的重庆百货大楼,营业面积达 1.1 万 m^2 ,日均接待顾客 10 多万人次,年销售额 2 亿多元。在建的重庆商业大厦,建筑面积 7 万多 m^2 ,将办成大型零售商场和多功能商业服务大楼。

1988 年,全市国营商业购进工业品总额 35.69 亿元,比 1950 年增长 50 倍,比 1978 年增长 78.84%;总销售额 40 亿元,比 1950 年增长 75 倍,

比 1978 年增长 90%。社会商品的销售量大幅度增长。各种衣着用布由 1952 年的 3716 万米增至 1988 年的 10750 万米。呢绒由 1952 年的 7 万米增至 1988 年的 476 万米。床单由 1953 年的 7 万条增至 1988 年的 173 万条。皮鞋由 1952 年的 2 万双增至

1988 年的 565 万双。电视机由 1970 年的 87 台增至 1988 年的 25.9 万台。电风扇由 1955 年的 1558 台增至 1988 年的 51.5 万台。电冰箱由 1983 年的 1384 台增至 1988 年的 11.2 万台。洗衣机由 1983 年的 3.3 万台增至 1988 年的 15.8 万台。

第三节 饮食服务业的发展

重庆的饮食服务业,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清,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庆的饮食业,在漫长的岁月里,以承办宴席的包席馆为主。19世纪初,既包席又零售的餐馆兴起。宣统元年至二年间开办的留春幄餐馆,是重庆最早的餐馆。30年代,全市有中餐馆 89 家,西餐馆 7 家。抗日战争时期,各种风味的餐馆迅速发展。民国 31 年,全市有餐厅 320 家,其中川馆 110 家,江浙馆 45 家,京津馆 27 家,粤菜馆 15 家,鄂菜馆 15 家,豫菜馆 75 家,湘菜馆 5 家,徽菜馆 3 家,西餐厅 25 家。民国 34 年,重庆有饮食店 11954 家,从业人员 65108 人,旅馆业 1160 家,从业人员 8725 人。

重庆市境内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游客前来重庆凭吊、瞻仰、游览者甚多。旅游业

的发展,促进了重庆饮食服务业的更大发展,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及社会各部门办饮食服务业的局面。1988 年,全市有饮食网点 2.6 万个,人员 6.4 万人,其中:国营 470 个,人员 6902 人;集体 4804 个,人员 2.2 万人;个体 2.07 万个,人员 3.5 万人。全市有服务业网点 3.1 万个,人员 5.3 万人,其中:国营 392 个,人员 4788 人;集体 8484 个,人员 2.2 万人;个体 2.2 万个,人员 2.6 万人。1956 至 1988 年,累计办培训班 111 期,培训厨师 2791 人,其中行业内 1744 人,行业外 1047 人,获得各类技术职称的 6334 人,其中特级厨师 51 人,特级招待师 9 人,一级厨师 92 人,一级服务员 55 人,受聘到美国、法国、西德、孟加拉、埃及、马尔他、乌干达等国家工作的厨师 315 人。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重庆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商周时期,重庆是古梁州贡道的起点。巴国时期,“巴人立市于龟亭北岸”,已有集市形成。战国时期,巴郡产的布流入于大夏(今阿富汗一带),蒟酱运至番禺县(今广东番禺县),漆器行銷朝鲜。西汉时期,经济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重庆与长江流域及四川东部、北部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已发展成为较大的物资集散地。长江重庆段“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嘉陵江上也是“商贩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重庆城区一带,“两江商贩舟楫旁午”,水运繁忙。宋熙宁十年(1077年),重庆地区的总税额超过了当时全国商税额较高的杭州。清雍正年间,川江航运日趋繁荣,各地产品纷纷由嘉陵、沱江、岷江顺流而下,汇集重庆再转运长江中下游及出口国外。长江下游一带的货物也沿长江运至重庆销售或中转各地。重庆既是长江东西贸易干道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之地。除水路之外,陆路有成渝大道,重庆至达县的川东大道,重庆至贵州的綦桐干道,客商不断,熙熙攘攘。重庆经涪州(今涪陵)、龚滩、龙潭,转湖南常德、郴州入广东的陆路运输也迅速发展。乾隆

年间,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城外,“九门舟集如蚁”;城内街巷有240余条,各种商业街五六十条,店铺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先后建立广东、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湖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10省会馆,全市有各类商帮25个,各业牙行150余家。有“左右两条江,上下十三帮”之说。

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庆辟为商埠后,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上升,洋货的进口增加,物资吞吐集散的规模扩大。光绪十六至宣统三年,外商在重庆开办的洋行公司达51家。光绪三十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民国2年(1913年),重庆总商会将重庆府署改为商业场,场内有店铺203家,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民国8年,重庆商业行帮公所由光绪二十八年的12个增至22个。民国21年,重庆市场上已有32个大行业,3700多商户。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商业有很大发展。民国34年,重庆有商业公司1400家,人员8614人,零售店铺4.8万个,人员22.26万人,商业行业组织比抗战初期增加5倍。1949年,全市有各类商家27316户,

商业同业公会 91 个。

1950 至 1978 年,重庆的商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1979 年开始,在流通领域实行改革,发展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市场更加繁荣兴旺。1988 年底,全市有商业网点 22.7 万个,从业人员 44.7 万人,其中,国营商业网点 0.79 万个,从业人员 7.95 万人;集体所有制网点 5.66 万个,从业人员 16.4 万人;个体户网点 16.2 万个,从业人员 20.3 万人。国营、供销社商业购进总值 84.9 亿元,销售总值 93.8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93.9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8 倍,比 1957 年增长 10 倍,比 1978 年增长 4.1 倍。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以 1950 年为 100,1952 年为 108.7,1957 年为 116.5,1978 年为 153.1,1988 年为 287.2。

重庆已发展成以冶金、机械、化工、纺织、仪表、食品工业为主体、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88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201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52.6 倍。其中,轻工业产值 90.2 亿元,年产纱 5.79 万吨,布 2.88 亿米,摩托车 44.02 万辆,电风扇 77.9 万台,电视机 28.16 万部,洗衣机 56 万台,饮料酒 15.58 万吨,皮鞋 383 万双。农业总产值 4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1 倍。猪肉产量 57 万吨,禽蛋产量 6.2 万吨,柑桔 7.84 万吨,蚕茧 2.72 万吨。

地区间横向联合和协作关系有很大发展。截至 1988 年,已建立跨地区联合体 88 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建立了“窗口”和联合经营中心 45 个,已和 28 个省、市、区建立起广泛的经济协作关系,商品辐射全国各地。每年举办各类工业品展销会、供货会上百次。1988 年,重庆经济协作区首届商品交易会,参加单位 200 家,与会代表 2000 多人,商品成交额近 2 亿元;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四届五省六方商品交易会,重庆成交额达 2.29 亿元,占成交总额的 26%;在新落成的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大厦举办的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第六届商品交易会,有 62 个成员单位和全国 500 多家工商企业的 8000 多名代表参加,重庆各工商企业为交易会提供地方产品达 7.4 亿元,占总货源的 60%,成交额为 5.45 亿元。这一年,国营商业系统自省外调入商品 3.4 亿,比 1950 年增长 10 倍;调出省外 3 亿元,比 1950 年增长 30 倍。

第三章 川东门户——万县市场

万县位于四川东部,地跨长江两岸,扼川江咽喉,历来被视为川东门户,是川东、湘西、鄂西、陕南和黔东北的物资集散地。

万县于东汉始建羊渠县。蜀汉后主建兴八年(公元 230 年)改称南浦县。后又改为鱼泉、万川、万安、万州等。明洪武六年(1373 年)改称万县,光绪三十八年,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辟为商埠。民国 6 年设立海关,民国 14 年开埠。民国 17~23 年,曾改县设市。1949 年 12 月解放后,又分县设市,为万县专员公署驻地,全市面积 248 平方公里。1988 年,人口 31 万,其中城市面积 6.4 平方公里,人口 17 万。

万县处于水陆交通要冲。水运,是全省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港,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上至重庆,下抵上海,大型客货轮终年通行。现有码头 48 个,画船 76 艘。港口年吞吐量近 180 万吨。陆路,先后建成万梁(平)、万开(县)、万忠(县)、万利(川)、万云(阳)五条公路干线。以万县为中心,西经梁平、大竹、垫江与重庆、达县相连,南经利川、恩施与鄂西相通,东经云阳、奉节到巫山、巫溪,北经开县直通城口、万源。从上海到拉萨 318 国道线横贯其间,公路运输与长江水运相交织,形成了水陆运输网络。1988 年又开辟了万县(梁平)至成都的民用航空线。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清末民初,万县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牛羊皮、猪羊毛、黄裱纸、棉花、桐油、药材、生漆、柑桔等。

万县市场农产品的集散,首推桐油。万县及附近各县是桐油主产区,产油特丰。抗日战争前,万县、忠县、云阳三县年产量30万担,占全省产量的50%。民国6至26年的20年间,是万县桐油市场的鼎盛时期,中外客商云集万县采购桐油。川东各县和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涪陵、石柱、丰都、长寿等县的桐油直接运万县成交。川西北的万源、宣汉、开江等县的桐油也由陆路人挑畜驮,集中万县。陕南的安康、湖北的利川、来凤、恩施、湖南的龙山等地的桐油,亦集运万县出口。除此以外,重庆以上近40个县的桐油,全部或部分在万县成交。每年清明前后是桐油成交的旺季,有“清明油,满街流”的谚语。民国24年,经万县出口的桐油达29.2万担,经重庆出口的12.9万担。民国25年,四川出口桐油57万担,经万县出口的41万担,经重庆出口的16万担。当时,万县靠桐油维持生活的不下20万人。民国6至26年间,万县市场成交的桐油占全省出口总数的65.6%,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7.48%。万县市场的营业额中,桐

油的营业额占70%。民国27年,武汉沦陷,长江水运中断,出口困难,桐油价格直线下滑,来货稀少,万县桐油市场处于低谷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6至38年上半年,长江航运畅通,国际市场对桐油的需求剧增,万县桐油市场又趋好转,外县桐油纷纷运万县,转口外销。1949年下半年,桐油市场交易清淡,油铺、行栈倒闭、歇业者达3/4。解放后,因体制的转换,万县桐油市场无形消失。

1950年成立中国油脂公司万县分公司,开展桐油收购业务,同时在市内陆家街、胜利路设立桐油交易所,规定桐油交易全部纳入市场成交。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普遍存在重粮轻桐思想,砍伐桐树。1954年,桐油实行统、派购政策,禁止私商自由经营。1958年大炼钢铁期间,桐树又遭严重破坏。此后,万县市桐籽产量下降。1962年,桐油由粮食部门独家经营。1978年,全国桐油工作会议后,采取发展和保护桐树的措施,产量始见回升。1984年,将桐油由二类物资改为三类物资,允许多渠道经营,桐油市场又开始活跃起来。

万县山货市场形成已久,其中以牛羊皮为最,黄裱纸、生漆次之,猪鬃、

鸭毛又次之。万县辟为通商口岸后,美、英、法、日、德等国商人接踵而至,大肆收购山货出口。货源来自川北的绥定(达县)、梁山、开县、忠县、丰都、涪陵及湖北省的利川等地。民国6年,出口生牛皮9771担,价值24.5万海关两。羊皮19.6万张,价值22.7万海关两。30年代山货出口每年约值洋五六百万元。民国24年,羊皮出口33.1万张,价值19.5万海关两,牛羊皮的商户为27家。民国26年,出口生牛皮1.4万担,价值29.8万海关两。民国28年,经营牛羊皮的商户增加为40家。50年代以后,万县的山货业由国营万县土产、畜产两公司经营。

黄裱纸。梁山、大竹一带出产,年产量50~60万担,由万县转销两湖及川东北等地。

药材。四川所产之中药材,品种繁多,销往全国。川西中药材多集中于重庆转口,川东、川北、鄂西、黔西等部分地区的中药材则集中万县出口。在万县市场上的主要中药材有:党参、黄连、厚朴、当归、吴莞、枳壳、银耳、大

枣、桔梗、天冬、桔子、五加皮、续断、苡仁、防风、泡参、木通、巴豆等。万县常年输出药材总值50余万海关两。万县市场中药材价格一般低于重庆市10%,药材商人乐于到万县采购。万县药材出口以厚朴、黄连为大宗。每日启航的轮船,都装有药材,有“离了药材不圆载”之说。每周有二三百件药材运销全国各地。民国23年,万县药材业在百家以上,从业人员1100余人。1955年成立万县地区中药材站,负责药材的采购、供应、出口等业务。

柑桔,也是万县市场的大宗土特产品。据《万县乡土志》载:清末民初,万县“桔子一宗岁出银二万两,本地购者十之三,水运出境者十之七”。“今县治苎溪夹岸有桔市,各乡争赴,日中益盛”。可见万县柑桔产量之丰,交易之盛。解放后,政府对柑桔的生产和经济效益极为重视,全地区共种柑桔80多万亩。有柑桔树4700多万株,年产柑桔10多万吨。著名的有万县大红袍红桔、梁平柚子、奉节脐橙等品种,日销四五万斤。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清末民初,万县的工业很落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作坊,主要行业有食盐、土纺土织、刺绣、缝纫、印刷、酿酒、小五金等。绝大部分日用工业品

要靠外面运进。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麻厂、万原造纸厂、第27兵工厂等迁到万县,促进了万县工业的发展,全县从事棉纺、制

革、皂烛、铁器、碾米、酿酒等工业生产的企业达 702 家。这些企业的产品,除供应本县外,还销往邻近各县。

解放后,万县工业有较大发展,其中以食品工业发展最快。1986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61777 万元,比 1952 年的 873 万元增长 70 倍。

食盐。早在汉代,万县井盐就很发达,设有管理生产销售的盐官。历经数朝,久盛不衰,清代,开采规模扩大。县东一里的盐厂和县西南一百里的长滩盐井一带,成为“商贾辐集之地”。民国 4 年,万县设立万楚、巫楚两大盐运公司,垄断了云阳盐场和大宁盐场的食盐运销。后因于民不利,遂取消公司专卖,改为自由贸易。民国 5 年,有民营盐业运销行业 20 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海盐产区相继沦陷,原为海盐供应的湖北武汉以西及西北,惟赖川盐济销,川东地区各盐场以万县为主要中转地。民国 32 年,为国防储盐,万县等城市实行计口售盐,按月定量配给。民国 34 年,川东局储盐量达 14 万担,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后,为盐业公司经营。

棉纱。随着棉织业的发展,万县的棉纱进口业务兴旺。民国 17 年,“棉纱自舶来者十之六七,自湖北官纱局购

者十之三四。除座商外,陆路运销忠属、顺属一带;水运则抵重庆。每包重 320 斤,每岁约销 10 余万包,合计可售银一千万两上下”。经营棉纱业务的纱号曾达 30 余家。民国 26 年后,棉纱市场疲软,纱号减少 20 余家。1950 年成立国营花纱布公司,主要经营花纱业务,对私营企业逐步采取限制的办法。

食品。食品工业是万县地方工业的主体。1988 年,全市有食品工业企业 39 家,产值 1.2 亿元。其中万县市食品罐头厂产值 4421 万元,有 50 多个品种销往国外,全年出口 7412 吨,创汇 1116 万美元。著名的太白酒厂,年产曲酒 5000 吨,主要产品“诗仙太白酒”,以诗人李太白命名,以窖香浓郁,醇和绵软,甘冽净爽,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而著名。1959 年被推荐为国庆 10 周年国宴用酒,得到中外来宾的赞誉。1963 年起,被评为四川省名酒。1984 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诗仙太白酒的系列产品 39°诗仙太白陈曲、52°诗仙太白陈曲、南浦大曲、花林春均获省、地优质(秀)产品称号。1988 年,诗仙太白牌 30°太白陈曲获国家优质产品称号,获国家银质食品奖,畅销国内外。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从唐宋到明清的一千余年间,四川的粮食、井盐、蜀锦、桐油等物资大多由万县用木船运至荆楚,转销中原各地。光绪初年,有盐号、当铺、钱庄、苏货、京货、绸缎等商店百余家。在川江未行轮船之前,由鄂入蜀之官、商行人,必由此登陆,循梁平、大竹、南充入省(称小川北路),呈现“灯火万家,廛市数里”的景象。

自开埠设关以后,英、美、日、法、德等国纷纷来万县开洋行,设公司,修码头,建油库,外国洋行、公司多时达30余家。随之兴起了一批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桐油、猪鬃、煤油、棉纱等行号,桐油铺150余家,山货商50余家,纱商30余家。年进货四五万包。进出口贸易均为洋行买办、大商号所垄断操纵。此外,还有代客买卖的经纪人和行栈。30年代,万县成为全国最大的桐油贸易市场,商业盛极一时,被誉为“万商之城”。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发展,30年代初,商业繁荣的二马路,全部改建成3层以上的楼房,并建成了高达11层的西山钟楼和西山公园。同时,还建设有堆放货物的仓库。储存桐油的油池等现代商业设施。

抗日战争时期,省外40多家工厂及学校、商行迁入万县,人口由17.5

万骤增到35万。进出川的桐油、粮食、食盐、花纱、布匹、山货、药材等大宗货物,均在此集散。宜昌、沙市失守,长江航运受阻后,桐油业逐渐衰败。但是,万县仍为棉花、土产、猪鬃、药材、布匹、黄裱纸的重要市场。民国34年,全市经营花纱、布匹、百货、粮食、粮油等商户共256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商贸渐趋衰落。

1950年,万县有私营工商业6753户,其中行商109户,座商2506户,摊商3309户,饮食业644户,服务业305户。国营粮食、百货、花纱、五金等公司成立后,对主要商品统购统销,并逐步取代批发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商品流通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万县市场发展缓慢。1978年改革开放后,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扩大商品流通,市场日趋活跃。1980年,全市共有商业网点4454个,从业人员11.4万人。其中个体3271家,从业人员4160人。为了拓宽布场,沟通信息,还先后在北京、厦门、武汉、岳阳、宜昌、重庆等地开设了贸易窗口,组织了技术、劳务、地方产品出川,繁荣了市场,搞活了流通。国营商业全年国内纯购进总值完成5.8亿元,国内纯销售额完成4.9亿元,出口创汇突破1000

万美元大关。

在发挥商业固有优势中,万县夜市重放异彩。每天晚上濒临长江的“胜利路”上出现了一个繁荣兴旺的夜市。水果、竹编、藤器、皮鞋、皮箱、细砂石磨、三峡石等,以及各种名小吃,摆满

大街两旁。入夜,上下水客轮陆续抵港靠岸,旅客倾仓而出,争睹夜市风光,品尝小吃,购买土特产品,每夜参加夜市交易的常达5千人左右。1988年夜市成交额达616万元。

第四章 乌江流域物资集散地——涪陵市场

涪陵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缘,乌江与长江交汇处,是川东南和湘西、黔北水上交通的咽喉,是乌江流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涪陵古名枳,春秋战国时曾为巴人聚居地。秦置枳县,至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北周立涪陵镇,隋改涪陵县,唐设涪州,直至清代。1913 年复称涪陵县。1983 年 10 月撤县建县级市。全市面积 2946 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 5.8 平方公里。1988 年末总人口 101.5 万,其中城镇人口 17 万。解放后,为涪陵地区行署所在地。

涪陵是川黔湘鄂四省边区贸易中心之一,物资集散以长江、乌江水路为主。乌江流经川黔两省 47 个县,全长

1037 公里。乌江下游的龚滩等大险滩,经过历代整治已成为连接川湘、川黔的重要运输孔道。30 年代,涪陵到龚滩平均 45 天一个航次,60 年代后只需 3 天。川湘公路未通车以前,乌江流域陆上运输全赖肩挑背驮。1956 年建成涪(陵)南(川)公路,以后相继建成通往邻近县的涪垫(江)、涪丰(都)、涪鸭(江)公路,逐渐形成水陆运输网络,物资集散范围扩大,物资集散量倍增。70 年代乌江最大货运量 73 万吨,1985 年突破 100 万吨大关,1988 年水路通航里程 349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1168 公里,货运量 387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75 倍。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乌江下游流域,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农副土特产品十分丰富。秦代及其以前,涪陵是乌江流域的盐、丹、漆、蜜、蜡、茶的集散地。秦代,巴寡妇清以开采和贸易丹砂成为闻名天下的富豪,秦始皇为之筑怀清台。唐代,涪州荔枝贡运长安。明代,是四川“木纲”的集散地。清道光、咸丰年间,涪陵和外地商人已将农副土特产品和特货(鸦片烟)运到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地出售,换回苏广杂货。清末、民国年间,涪陵市场集散的主要商品有生漆、五棓子、牛羊皮、青麻、中药材、木材、桐洞、木油、猪鬃、榨菜、特货等。民国 21 年,涪陵出境贸易额达一亿银元。30 年代,涪陵是四川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常年输出 2 万担,最高年达 10 万担,价值数百万至千万银元。1932 年、1935 年鸦片输出分别占输出总值的 77%、34%。

50 年代,山区经济有很大发展。60 年代,市场集散的商品又增加了茶叶、烟叶等。70 年代以后,涪陵的茶、丝、卷烟、麻纺织、皮革等加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乌江流域所产的原料多集中在涪陵市场。1961~1985 年间出口桐油 51975 吨,出口最多的 1980 年达 5372 吨;猪鬃,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外贸部门平均每年收购 2788 担,1988 年收购 3292 担;茶叶,1950 至 1985 年,外贸部门收购 59 万余吨,红碎茶远销美国和欧洲。近 10 年来,林牧副业有较大发展,烤烟、油菜、麻类、腌腊肉制品成为全省重点产品。1988 年,集散量大的商品有生猪 35 万头,桐油 8000 吨,猪鬃 3000 吨,茶叶 2000 担,烤烟 13000 吨。全市有国合农副产品采购(供应)机构 281 个,职工 1366 人,购进总额为 14404 万元。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光绪十七年(1891 年),重庆开埠以前,洋布、洋纱、煤油等已由汉口、万县、重庆等地中转进入涪陵市场及乌江流域。清末、民国年间,工业品输入

上升。日用工业品主要购自重庆、汉口、上海等地。民国 21 年,输入盐、糖、酒、棉纱、绸布、五金、瓷器、化妆品等商品,总值 556 万元。30 年代,有大小

商号 1500 余家,商贩 1453 户。手工行业 37 个,业户 2932 家,产品数百种,供应县内及乌江流域。抗日战争时期,涪陵成为陪都重庆的门户,一时厂商剧增,钱庄、票号、银行林立,两江沿岸近百家堆栈,仓储货场相接数里。相当部分由越南、缅甸入境的外援物资,经川湘公路和乌江水路转运重庆。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工业和商业逐渐衰落。解放前夕,涪陵只有少数现代工业和一些手工业作坊,产品有原煤、砖、瓦、棉布、松香、火柴、肥皂、犁铧、铁锅、植物油、肉制品、榨菜等四五百个品种,其中榨菜、松香等销往省外或国外。

50 年代开始,涪陵的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榨菜、腌腊系列肉制品、花粉系列糖果糕点、油类制品为主的食品工业;以丝绸、麻纺、棉织、造纸、制革为主的轻纺工业以及机械、化工、建材、能源工业等。历史悠久的涪陵榨菜,以其鲜、香、嫩、脆的风味,与欧洲的甜酸甘兰、酸黄瓜齐名,被誉为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先后多次获国家银质奖和省、部优质奖,行銷国内外。涪陵地区的榨菜产量居全国

首位。涪陵市的榨菜产量又居全地区首位,1988 年产 74861 吨,占全地区产量的 78%。1988 年涪陵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6.08 亿元,比 1952 年的 1720 万元和 1978 年的 1.37 亿元分别增长 34.4 倍和 3.4 倍。

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工业品的中转也发生了较大变化。70 年代以前,涪陵在万县百货站进货。1971 年成立涪陵地区百货、五交化二级站,担负涪陵地区 10 县(市)日用工业品的收购和供应任务,经营针、纺、文、百、五交化等各类商品一万余个品种。1988 年,地区百货站商品调拨量为 4892 万元,比 1972 年的 9419 万元减少 48.10%;地区五交化站商品调拨量为 2731 万元,比 1972 年的 764 万元增长 2.57 倍。

1988 年,全市有工业品采购批发机构 77 个,其中国营商业 24 个。全年社会商业工业品购进总额为 5.2 亿元(其中国营商业购进 3.2 亿元),销售 5.9 亿元(其中国营商业销售 38334 万元)。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涪陵历来是乌江流域物资集散地,商品交易兴旺。从战国以来,乌江一直是食盐贸易的运输路线。唐宋至

明清,江浙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来涪陵开坊设店,组织行帮会馆,城区先后形成了铁炉街、铜匠街、柜街、箱子街

等手工业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有场市99个,民国18年(1929年)增至150个。这些场市分布在长江和乌江沿岸,对物资集散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国21年物资集散量为4.8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涪陵市场兴盛,民国30年集散物资增至24.3万吨。解放后,工农业生产发展,商业兴旺。1988年,集市由1978年的20个增加到86个,集散物资为204万吨。

1964年以前,进入乌江流域的物资必须经涪陵市场集散中转。1966年乌江航道涪陵段可昼夜通航,集散物资多由产销地直接运达,经过涪陵中转的物资减少。60年代以后,随着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乌江流域农副产品、矿产品和粗加工品的吸纳增多,涪陵仍然是乌江流域和川东南最大的物资集散地。1985年输入石油5.7万吨,化肥、农药16万吨。1988年中转煤炭50万吨。过去,日用工业品主要购自重庆、上海等长江沿岸城市,销售地区主要是乌江流域。1978年以后,由于流通体制改革,工业品的购销已扩大到全国10省市的100多个点,涪陵的部

分工业品已进入国际市场。

交易形式也有创新和发展。1988年11月,涪陵市举办首届“榨菜之乡”商品交易会,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827个单位参加,生意兴隆,其中,榨菜成交2877万元,交易会中的科技市场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涪陵的饮食、旅馆、理发、照相等行业是随着涪陵市场的形成和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的。50年代以前,涪陵饮食、服务业多为小店堂,设备简陋。70年代末,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一些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相继设立招待所,南山楼、通仙楼、清香、涪州宾馆、中山宾馆等中、高档餐馆、旅馆先后建成使用;一些集体、个体饮食店、理发店、照相馆遍布涪陵城区乡镇,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1988年,全市共有饮食业1501家,从业人员3576人,分别比1954年增长0.5倍和1.41倍,比1980年增长3.95倍和1.19倍。有服务业3294家,从业人员4149人,分别比1954年增长6.99倍和5.48倍,比1980年增长10.09倍和2.46倍。

第五章 川东北物资集散地——达县市场

达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地处大巴山南麓,州河之滨(州河、巴河流经县境汇于三汇镇始称渠江),历来是川、陕、鄂三省边界的交通枢纽和川东北的物资集散地。

达县始建于东汉和帝时期,初名宣汉,先后更名为石城、通川、达州、达县,历为巴渠郡、通州、达州、绥定府治。1976年设达县市(县级),为达县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全市面积266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28.04万,其中城镇人口17.55万。

达县扼陕、鄂入川东北的门户。南通重庆,西达川西。沿渠江水系,上通宣汉、万源、平昌、通江、巴中、南江,下连渠县、合川、重庆。沿涪江、嘉陵江,通航南充、遂宁、绵阳等地。陆运有1939年通车的汉(中)渝公路和解放后相继建成的达巴(中)、达万(县)、达渠(县)等公路。1978年建成的襄渝铁路穿越市区。1960年开辟达县至成都、重庆、南充的空中航线。交通运输相当发达。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达县市和邻近各县,历为四川主要农业区之一。主产米、麦、玉米、油料、苎麻、茶叶、桐油、生猪、耕牛、黄花、木耳、香菇、棕片、生漆及名贵药材

天麻、杜仲、红花、黄柏、麝香等,大多经过达县市场集散。

粮食。主要来自达县各乡和宣汉、平昌等县,经罗江、石梯、城关等三处

粮食市场集中成交,运销合川、重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部为保证军需民用,指令达县商会成立“达县米粮业购运总社”,集州河、巴河流域及川东北各县米粮,纳入总体运输,供应战时陪都——重庆。运粮极盛时期,达县港每天发运粮食35至50万斤。民国31年运销米麦105万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的“中粮公司”,以及国防部的联勤总部仍继续在达县设置办事机构,专营米粮购销业务。

桐油。主产于达县、渠县、平昌、大竹、宣汉、万源等县,经达县运销重庆、万县出口。抗日战争时期年输出约1.2万担,1947年达3.6万担。1951年后产销日衰。

苎麻。是达县特产之一。民国6~15年,最高年产量4.5万担。毁麻种鸦片,曾使产量下降。禁烟后,到抗日战争后期,年销量上升到6万担(含大竹转销),以原麻、麻布、麻绳、麻纱等产品销往各地。1947年销麻布22.8万匹。解放后,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苎麻产量有所下降。80年代逐步

恢复,并有发展。1985年产量达到23.9万担,达县、大竹的麻纺工业也相继兴起。

耕牛。达县双庙场和蒲家场,分别在清乾隆、道光年间,形成水牛和黄牛为主的牲畜交易市场。兴盛时期,每场上市四五百头或五六百头,牛源来自县境各乡和大竹、宣汉、平昌等毗邻县。陕西、湖北、成都、温江、内江、绵阳、遂宁、南充等地的牛贩和农民上市购买。1952年,耕牛逐步由达县地区供销社组织外销,1952~1982年共调剂外销耕牛102.7万头。1982年后又逐步开放了耕牛市场。

生猪。民国年间,除自给外,有少量活猪运销重庆。50年代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生猪生产,全地区生猪饲养量由110万头发展到1988年末的567.6万头,大多经达县加工后运往大城市和工矿区销售。为了改活猪为冻肉制品外销,1988年全区已建成肉食冷冻库1.46万吨(达县市境内0.81万吨),外销冻肉制品1.5万吨。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解放前,达县市场输入的工业品为土布、匹头、丝绸、棉纱、盐、糖、酒、煤油等。盐、糖来自自贡、内江。棉纱、匹头、丝绸来自沪、汉、成、渝。土布来

自广安。洋广杂货、煤油等来自渝、万。输出商品以黄裱纸、蚕丝为大宗。50年代后,人民政府利用达县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矿藏资源发展现代工

业,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达县市已逐步发展成为以轻纺工业为主体,包括冶金、机械、食品、电力、煤炭、化工、建材、军工等 14 个大类的 69 个行业,轻纺、食品工业是达县市的两大经济支柱。1988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 6.2 亿元,其中食品工业产值为 14686 万元。主要产品的产量:钢和钢材 16.9 万吨,水泥 10.39 万吨,棉纱 8740 吨,煤炭 130 余万吨。达县市场输入、输出的主要工业品有:

食盐:由自贡运来。民国初年,达县渠河运盐公司曾垄断渠江沿岸川东北各县的食盐经营。民国 25 年销盐 10.5 万担。抗日战争时期,达县商家还运销川盐到汉水地带。解放后,由国营盐业公司统一经营。

黄裱纸。黄裱纸为宗教迷信用纸,产于达县、大竹、梁平等地,为农民的主要副业,途经达县销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湖北、江西以及印度、缅甸等地。民国 25 年,产量 60~70 万箱(每箱 24 合,每合 80 张),年输出值白银 11 万多两。黄裱纸运西安转销各地以后,购回陕南棉花和药材,年输入棉花 650 万市斤,转销渠江沿岸和重庆。棉花、黄裱纸的进出,人背畜驮,络绎不绝,呈现“白龙进,黄龙出”的盛况。民国 34 年时,经营花表行业者 11 家,资本额 67 万元。1951 年后,人民政府对黄裱纸业已劝

其改行转产,近年又有零星产销。

蚕丝。达县栽桑养蚕,由来已久。乾隆《直隶达州志》载:“生民之利,莫过于养蚕”。达州官府对“无桑人户,定以惰民责处”。光绪三十四年产丝 2396 把(每把重 122 两)。民国初年,达县有“朝阳”、“金华”、“回龙”、“中孚”四家缫丝厂,还有农民利用农闲缫丝者。晚清时代,生丝销重庆。民国初年,直销汉口、上海,获利甚厚。民国 15 年,县城黄龙寺已成为邻县生丝交易市场,年成交 5000 余把,精选出口得白银 68 万余两。次品织绸制带,销渠江沿岸各地。解放后,平昌县生丝已列为全国基地县,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纺织业。达县地区棉纺织染厂兴建于 1958 年。1985 年产值 9171 万元,出口棉纱 6519 件,出口棉布 189 万米。达县已成为大巴山区重要的纺织基地。

酿酒业。解放后发展较快。1988 年,全地区产白酒 6.8 万吨,比 1978 年的 2 万吨增长 2.4 倍,其中:达县市产巴山大曲 2200 吨,小桥酒 4000 吨,质优价廉,畅销 20 余省、市。绥定牌啤酒获中国保健食品“金鹤林”奖,1988 年产 1.5 万吨。

达县的灯影牛肉久负盛名,1988 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金奖。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东汉和帝年间(公元89~105年)建县时已形成初级市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市场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随着州河航运的开发,鄂渝客商往来频繁,商业贸易发展,城区形成“花表行”、珍珠、玛瑙、绫罗、绸缎市场。驻达县经商的客籍商人,先有湖北黄州人组建的齐安公所,统筹同乡商贾事宜。后又建立“湖广会馆”、“闽粤会馆”、“江西会馆”等客商会聚之所。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在达州设行台总理军务,常设粮台统筹军需,有相当部分军费注入市场,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嘉庆七年(1802年)升达州为绥定府,达县竟成了川、鄂、陕毗邻地区盛极一时的军事、商业中心。清末,民族工商业兴起。民国元年(1912年)达县成立商务分会,有24个行业。城关居民2300余户,铺面1800余间,正南街的洋广杂货铺,滩头街的花表行,珠市街和兴隆街的绸缎百货铺,永丰街的油盐铺,以及粮食、山货、药材市场,生意兴隆,客商云集。客籍商人形成帮口,有花表行的“黄州帮”,匹头业的“汉阳帮”,山货业的“渝帮”和米盐业的“合川帮”等。随着商业的发展,买卖“申票”、“汉票”的金融汇兑业务应运而生。抗日战争时期,长江航运中

断,原由长江入川的工业品,部分改由汉水和陆路小道,经达县转销川中、川北,市场商品集散量大增,加之部分沦陷区商家内迁达县,投入部分资金从事商贸经营,市场更趋活跃。川东北米麦、木材、土铁、桐油、药材、山货及陕棉等物资,经渠江源源不断供应重庆,购回工业品转销各地。州河码头,桅竿林立,装卸繁忙,小吃叫卖,通宵达旦,物资集散,盛极一时。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外客商回迁。解放战争时期,商家倒闭、歇业者多。1949年底,纯商业、饮食服务业只有1695户,市场冷落萧条。

50年代后,达县市和邻近各县的粮食、油料、苎麻、茶叶、桐油、药材等农副业生产迅速发展。食品、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化纤、钢铁、机电、天然气等工业正在建设发展中。改革开放后,各业兴旺,市场繁荣。多次物资交流会的召开,发展了横向经济联合,拓宽了达县市场的辐射面。1985年召开的第五次达县物交会,有26个省、市、区的代表参加,成交了12个大类的8000种商品,同20余省、市、区建立了直接贸易。生丝、纺织品、冻肉制品、灯影牛肉等商品还打入国际市场。达县市的物资集散量大幅度增加。1949年水运

进出物资仅 45.5 万吨(含短运),1985 年达县火车站运进各类物资 90.2 万吨,调出销售转运出境各类物资 54.5 万吨,还有汽车运进运出的物资 210 万吨(含短运)。1988 年社会商品零售额 30244 万元,比 1980 年增加 2.6 倍,市场益趋繁荣。

第六章 川南物资集散地——泸州市场

泸州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地处长江、沱江汇流处,历来为川南、滇东、黔西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泸州以盛产老窖曲酒闻名于世,素有酒城的美誉。

泸州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西汉置江阳县,东汉改江阳郡,梁称泸州,直至清末。民国初年改称泸县。解放初期设市,复称泸州,为川南行政公署驻地。1952年改为专辖市。1983年又改为省辖市,辖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5县和市中区,面积12343平方公里。总人口416万。市区

面积215平方公里,人口37.8万。

泸州东靠重庆,西连宜宾,北接内江、自贡,南与云南、贵州为邻。水运,顺长江东下,客货轮可直航重庆、武汉、南京、上海;溯江而上,可到宜宾、乐山。境内还有永宁河、赤水河等七条河流,通航里程达762公里。1988年,全市共有港口、码头53个,年货物吞吐量达300万吨,比解放初期20万吨增长14倍。陆运,有公路干线23条,泸隆(昌)、泸永(川)、泸叙(永)公路是川、滇东路的起点,也是成渝铁路连接云、贵两省的重要通道。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川南地区,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泸州(泸县)处于长、沱两江沿岸,素有“川南粮仓”之称。解放前,泸州是川南

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川南各县和云、贵等地运来泸州集散的商品有粮食、豆类、菜油、桐油、猪鬃、羊毛、药材、山羊

皮、茶叶、烟叶、蚕茧、干桂元等。泸州周围各县盛产大米,在泸州集散的商品中首推大米。民国 32 年(1943 年),由隆昌、富顺县运来泸州集散的大米约三四百万石;从叙永、古蔺、古宋运来泸州集散的大米二三百万石。这些大米在当地销售量小,大部分销往重庆以下沿江各城市,常年从泸州经长江运出的大米约 5000 载(船)(折合 420 万石)。民国 27~34 年(1938—1945 年)的史料记载,泸州(泸县)自产的农副产品中,年输出大米 21 万石、蚕豆 3.7 万石、小麦 1.6 万石、大豆 1.1 万石、菜油 100 万市斤、桐油 6 万市斤。主要销往自贡、内江、合川、重庆、万县、宜昌、汉口等地;年输出猪鬃 20 万市斤、羊毛 6 万市斤,销往重庆、上海;年输出干桂元 40 至 60 万市斤,销往湖北、贵州及省内各县;药材每年

输出 1500 吨,销往山东、上海、北京等地。

50 年代后,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大宗农副产品按计划收购,集市贸易范围逐渐缩小。“大跃进”期间,一度加以限制。“文化大革命”中强行关闭。1979 年后,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城乡集市贸易迅速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1988 年,全市农业总产值 11.37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8.5 倍。粮食产量达 164 万吨。输出商品糖 10 万吨。生猪收购 56 万头,调供省外 29 万头。外销猪鬃 2500 箱、肠衣 40 万根、山羊皮 9000m²,输出药材 1883 吨。特产桂元(龙眼)、荔枝总产 2300 吨,畅销省内外。烤烟产量 1.7 万吨,输出 950 吨。1986~1988 年,叙永县已连续三年获全国优质烤烟“金杯奖”。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50 年代前后,经泸州中转的大宗工业品有:

食盐。自贡、五通桥的食盐外运,泸州是必经之地。从明代开始在泸州设盐运使,直至清末。民国初年,废盐运使,设盐务局,实行官运商销。食盐从沱江运抵泸州后,一部分转运湖北销售,一部分由永宁河、赤水河运达滇、黔两省边区销售。40 年代,泸州有

盐商 17 家,转运的盐船有 584 艘,其中载盐运重庆以下各城市的有 400 余艘;入赤水河的有 50 艘;入永宁河的有 120 余艘。民国 33 年泸州食盐转运量 14.6 万吨。1952 年成渝铁路通车,大部分食盐改由铁路外运,泸州中转量降至每年六七万吨。1985 年,因工业用盐量猛增,当年中转量一度高达 15 万吨,市场年销 4 万吨左右。

食糖。内江、资中等地所产的红糖、白糖、冰糖、蜜饯由沱江水运泸州，除就地销售 10 余万市斤外，大部分转运重庆以下各城市销售。30 年代，泸州经营糖业转运和销售的商户有 20 余家。旺季每天有几艘至十余艘糖船转口外运，每年转运约 1000 万市斤。解放后，食糖是计划分配物资，省内食糖货源充裕时，有一部分食糖由泸州调出。1954 年市内收购食糖 7497 吨，内江调入 989 吨，区内销售 3376 吨，调渝、万、涪等地 5532 吨，省外 146 吨。省内糖源偏紧时，需要从省外调入食糖。1988 年，从云南调入食糖 5308 吨，维持本市市场供应。

百货。解放前，运往云南昭通、贵州毕节的百货、食盐必经泸州中转。50 年代后，两地的日用工业品仍由泸州跨区供应，但数量很少。1953 年的百货成交额仅为 154 万元。改革开放以后，经泸州流向两地的工业品日益增多，1988 年增至 3593 万元。

民国时期，泸州的工业品有一定发展。民国 4 年（1915 年），泸州习艺所产的平机宽布、劝工局纺织的洋布，均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分获三等奖和五等奖。30 年代，泸州年产纸伞 70 万把，竹篾 80 万把，经昆明集散，出口泰、柬、缅、印等国，年输出 100 万把。40 年代，泸州有大小织布工场 90 余家，年织布约 30 万匹（每匹 10.8 丈，值银 11 元），由城区 50 余家土布商号

收购，2/3 销本市及邻近县，1/3 销云、贵边区。年产铁锅、铁农具 50 万件，销往内江、资中、江安、叙永、古蔺及云、贵等地。解放后，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泸州已由一个商业性消费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以化工、机械、食品、轻纺、建材、能源等 50 多个行业的新兴工业城市。1988 年，全市有工业企业 2112 个，产品上千种，其中 27 种主要产品获国家质量奖和省以上优质产品称号，部分产品远销港、澳、欧美、东南亚、日本、苏联等国家和地区。1988 年工业总产值 16.6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42 倍。

酿酒工业。泸州酿酒的历史悠久。早期巴人已在此酿制味美醇甜的“清酒”，作为酬宾、祭祀之用。西汉时产米酒。三国时诸葛亮屯兵江阳，发明了用曲药酿酒，防治瘴疠。唐代出现庄园酿制作坊。宋代酒业兴盛。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泸州缴纳酒税 6432 贯，占商税的 34%。历代相传，酿酒技术不断改进。元代中叶泰定元年（1324 年），酿造出第一代大曲酒。明代洪熙元年（1425 年），又试制成功“窖藏”酿制的大曲酒。据永乐大典记载：泸州城内有酒肆一条街。万历年间（1573—1619 年）全城已拥有曲酒老窖 10 个。清末，曲酒年产量超过 100 吨。民国 4 年（1915 年），泸州有温水盛、天成生等 10 余家曲酒作坊，年产曲酒 240 余吨。同年泸州温水盛所产老窖大曲以

“浓香、醇和、爽甜、味长”的独特风格。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蜚声中外。此后，曲酒作坊逐年发展，民国34年增至36家，曲酒产量1300吨，半数经长江运重庆转销各地。民国36年以后，曲酒产量锐减。解放前夕，城内仅有曲酒作坊11家，产量下降到400余吨。

50年代开始，泸州酿酒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51年10月，国家赎买了金川酒精厂，建立国营酿造厂，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指调泸州大曲为宴会用酒。中商部曾于1956年、1985年共拨专款3276万元，发展曲酒生产和扩建泸州老窖4000吨曲酒生产基地。泸州城乡酒厂林立，形成国家名酒主要生产基地。最大的泸州曲酒厂拥有窖池1000多口，其中百年以上窖池有300余口，最老的明代窖池已大约使用400多年。泸州曲酒厂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曲酒生产工艺。1979年以后，先后受商业部、轻工部、农牧渔业部委托，举办了27期培训班，为全国20多个省、市300多个酒厂培训了987名酿酒和勾兑技术人员。1985年，泸州曲酒厂创办了全省第一所酿酒技术学校，已为本厂和省内外兄弟厂培训技术骨干486人，为浓香型白酒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泸州老窖特曲在国际上三次获奖（其中解放前一次），1952~1988年，国家举

办的五届全国名酒评比会上，五次蝉联国家名酒。1988年，泸州市的酒厂已发展到407家，白酒产量6.65万吨，其中，曲酒4.27万吨。通过总结推广泸州酒厂老窖工艺，已生产出玉蝉、三溪、仙潭、荔乡、江阳、泸江等几十个名优酒。老窖特曲、大曲远销五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出口最多的中国名酒。1988年，出口曲酒60吨，创汇40.26万美元。国内销售58941吨（其中售给省外18438吨）。年产值13013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9%，上缴国家利税占全市利税总额的26.4%。

泸州市属古蔺县所产郎酒，具有“酱香浓郁，醇厚甜爽，幽雅细腻，回甜味长”的独特风格，1979至1988年三届全国评酒会上三次蝉联国家名酒。1988年产量达1145吨。

化学工业。解放前，大型化工企业只有第23兵工厂（泸州化工厂前身），另有几家小型化工作坊。解放后，有较大发展，至1988年化工企业已达61家。主要生产合成氨、尿素、磷肥、烧碱、皮化、酶化、塑料、橡胶、纤维等产品，其中，国家优质名牌产品13个。大宗输出的产品有合成氨、尿素，1985年合成氨产量达42万余吨，尿素产量达67万余吨，分配全国各地。化工年产值45635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1.99%。

机械工业。解放前，泸州只有几家

小锅厂、小农具厂。解放后,机械工业发展很快,至1988年已有133家。主要产品有液压起重机、液压挖掘机、液压元件、液压附件、汽车配件等15大类200多个品种,跨入全国九大工程机械行列,产品畅销20个省、市和港、澳市场,出口东欧一些国家。年产值20835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4.26%。

其它工业产品增长也很迅速,其中外销产品细瓷,由1963年的84万件,增至1988年的1253万件。1988年还出口丝织品30万米,草席1000万张。这些产品主要出口丹麦、荷兰、新加坡、日本等国。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解放前,泸州商业比较繁荣,城区有66个商业行业,2000商户。沿江的几条街道是商贸、货栈的主要场所。各种货物由水路、陆路进出,货运繁忙。民国32年,泸州有银行、钱庄28家。40年代,每年在泸州市场营销的商品有:从上海、重庆等地购进各类纺织品20万匹,煤油5千桶,江浙海菜5万市斤,雅安茶叶10万市斤,什邡烟400担,自贡、五通桥食盐250万市斤,内江、资中红糖10万市斤。解放后,部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购进,仍保持原有进货渠道。食盐为大宗输入商品,每年约1.2万吨。随着市内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销售的商品中增加了烧碱、纯碱、石油、石蜡、机制纸、自行车、钟表、彩电、冰箱、日用百货等生产、生活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各类市场蓬勃兴起。1988年,全市有市场323个,集市

贸易总成交额达5.1亿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2.32%,比1979年增长6.68倍,年平均递增21.1%。城乡集市贸易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些较大的批发市场。

化纤批发市场。泸州化纤批发市场,是1984年在自发形成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建立起来的,现已发展成为连接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区的一个专业纺织品集散市场,拥有6个批发交易场所,511个销售点,面积1.43万平方米。上市纺织品达6000多件。上市人数约4~5千人。日均成交额20万元左右。从事化纤批发业务的客商有434户,其中国营27户,集体324户,个体83户。客商来自浙、苏、粤、湘、桂、滇、闽、黔及省内成、渝等毗邻地区。经营形式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价格灵活,自由协商,随行就市,交易活跃。在各路商贾中流传一种说法:

“买百货到成都,买化纤到泸州”。

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市内濂溪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是另一个初具规模的专业批发市场,拥有营业房 13 间,批发点 10 个。每天从事经营的有 1500 多人,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山东、河北等省及省内 31 个县、市。全年蔬菜水果批发量达 2500 万公斤以上,品种 30 多个。主要品种有贵州干海椒,南溪大葱,资中、荣昌老姜,筠连条粉、淀粉,云南、广西香蕉,山东烟台苹果,河北鸭梨,以及本地主产的蔬菜和柑桔、荔枝、桂元等,年成交金额 3000 万元。

实行改革开放后,交易形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举办交易会是新出现的一种重要形式。1987 年 9 月,泸州首次举办名酒节经济文化交流会,有

酒类、化工、机械、物资、资金等 15 个交易场所,并结合举办重阳节文学颁奖和重阳节音乐会。参加交流会的有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省内各市、地、州的各界人士 7000 多人,商品成交成效显著,其中:仅曲酒即销售 1.15 万吨,金额 1.05 亿元。1988 年举办第二届“名酒节”,意向性成交额较上届增长 13.7%。此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商品展销会、物资交流会等。

1988 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5.78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51 倍,年递增率 16.2%。全市拥有商业零售业、饮食、服务网点 5.96 万个,比 1979 年增长 5.41 倍,年平均递增 26.4%;从业人员 9.56 万人,比 1979 年增长 1.7 倍。

第七章 川滇物资集散地——宜宾市场

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后称长江,是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之一。全市面积1190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为66.44万,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3.39万。

宜宾是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古为僰人的聚居地。西汉置僰道县,后又有外江、义宾、宜宾之称。历代为郡、州、府治所,故又有戎州、叙府等称谓。民国时期,为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1951年建立县级市,先后为四川省宜宾专区专员公署和宜宾地区行署所在地。是生产五粮液酒的“名酒之乡”,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

宜宾与云、贵两省接壤,扼川、滇、黔交通要冲,素为川南重镇。宜宾的水

路交通方便,溯岷江而上,可到犍为、乐山;逆金沙江而行,可达屏山和云南绥江;顺长江而下,则可抵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三江均有轮船航行,四季畅通。还有南广河、关河、黄沙河贯穿其间,通达邻近各县。解放前曾有木船一千多只、轮船10余艘从事江河运输,每天进出货物上千吨。解放后,随着成渝、内宜和宜珙铁路相继通车,宜宾的客货列车可直达成渝,通向全国。公路四通八达,通往省内外。方便的水陆运输,为宜宾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城区有50多个行业,4000多家工商业户,经营门类较全,网点遍布全城,并有10余个物资交易市场,货源充足,外地客商云集,是川西南、滇东北、黔西北的物资集散地。

第一节 川滇贸易交往

宜宾邻近的屏山、高县、筠连、珙县、兴文等县与云南昭通地区毗连,历史上是川滇两省贸易的通道。川滇商贸交往是宜宾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记载,自元代起,四川食盐销往云南,云南山货销往四川,大多是通过宜宾市场集散的。随着宜宾与云南商贸关系的发展,云南来宜经商者日益增多。晚清时,云南商人在此修建了云南会馆,以开展商贸活动。

云南昭通地区物产丰富,又是滇东北的一大物资集散地。解放前,云南东北地区绝大部分货物都运往宜宾市场出售,终年人背马驮,络绎不绝,谚称“盘不完的昭通,塞不满的叙府”。40年代,昭通等地每年运往宜宾销售的主要农副产品有桐油、猪鬃、皮张、生漆、火肘、土笋、芋片、花椒等数十个品种,年销售50万担左右。药材有天麻、党参、半夏、茯苓、吴芋、当归、枸杞共200多个品种,年销售30万担左右。从宜宾购去的主要商品是食盐、土布、棉絮、皱帕和其他日用工业品。川滇商货运货以马帮为多,每天来往骡马一千多匹。南岸青草坝一带曾有宿马店10多家,可宿马一千余匹。民国30年,国民政府曾在南岸设有“川滇商贸护运社”,管理云南入川的贵重药材和

办理马帮来往手续。川滇商贸交往关系,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50年代开始,随着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相继建立,国家对商品实行计划管理,跨省贸易受行政区划限制,加之贵昆、成昆铁路的建成和公路的迅猛发展,物资流通渠道增多,流向变化,川滇边界商贸交往不断减少,人背马驮的运货现象也逐步消失,昭通与宜宾的商贸往来曾一度趋于中断。

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宜宾同云南昭通等地的商贸关系又重新发展起来。两地曾先后召开几次经济协作会和物资展销订货会,发展横向经济联营。昭通在宜宾市设立商贸办事机构,并有10余个公司(厂)在宜宾开设经营门市。还有药材、百货、食盐、粮食等各种物资转运站。1984年,昭通市与宜宾市结成“姊妹城市”,关系更为密切。云南的卷烟、白糖、茶叶和土豆、大蒜、苹果等商品,已大量进入宜宾市场;昭通所需的曲酒、糖果和日用工业品等,也不断由宜宾运去,宜宾同昭通等地的商贸交往再一次得到发展和扩大,对促进两地市场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解放前,宜宾是以农业为主的县,盛产粮食、花生、芝麻、菜籽和甘蔗、灯草、蔬菜等经济作物。著名的土特产品有“草席”、“芽菜”、“糟蛋”、“小磨麻油”等。邻近各县物产丰富,麻类、茶叶、竹木、桑蚕、柑桔、中草药等均以宜宾为主要集散市场。市场上的农副产品品种多,数量大。还有火柴、肥皂、土布、皱帕、丝烟、杂粮酒等各种日用工业品。40年代宜宾输出的大宗物资有:粮食,主销重庆及犍为、乐山一带和军粮采购;山货药材,年输出30万担左右,主销重庆、武汉等地;木材,主销上海等地;草席、芽菜等土特产品,销往省内外及港澳地区。从外地输入的物资主要是:犍为、五通桥的食盐,年输入4000万市斤;邻近各县流入的粮食(大米),年输入量为60万担左右;什邡的柳烟、夹江的土纸、隆昌的夏布、犍为的煤炭、乐山的木材等商品,常年不断地流入宜宾市场。民国24年以后几年的山货、药材成交量为:民国24年30.7万担,民国33年45万担,民国37年26.9万担,1950年24.4万担。

50年代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宜宾集散的农副产品有了更大的增

加。大宗农副产品主要有,茶叶:宜宾茶厂生产的红茶是全省红茶的主产地,占全省出口总量的40%,为全国三大功夫红茶之一。“早白尖”功夫红茶,1985年在葡萄牙第24届世界食品会上获金奖。烤烟:全区生产的烤烟都运往宜宾烟厂生产卷烟或调往外地烟厂。花生:宜宾生产的“叙府花生”行销省内外。柑桔:全国著名的江安夏橙、长宁罗伯逊脐橙以及质佳量大的红桔,多数都要运至宜宾外销出口。香料植物类的樟油:宜宾等县的产量占全国的70%,是国际外贸樟油最大基地,也要通过宜宾销往国外。久负盛名的宜宾竹制品:江安竹簧工艺品早在1919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已获得金奖,1983年又获国家金奖。宜宾竹雕、竹刻、竹编及竹家具等竹制品也由宜宾市场集散。生猪:1985年,集散量6000多吨。蔬菜:80年代,年市场交易量约5000万市斤。其他甘蔗、麻类、棬子、蚕桑、竹木等,多数也都要运至宜宾转销外地或供作宜宾生产纸张、肥皂、丝绸、食糖之用。

1988年,国营商业农副产品收购总值为10865.4万元,较1979年增加269.12%,销售10504.8万元,较1979年增加243.2%。

第三节 工业品购销

解放前,宜宾工业十分落后,只有少数土纺、土织、土染、土陶、冶铁、丝绸、绗帕等手工业品和以粮食作原料的土酒、豆制品、酿造品等。日用工业品绝大多数都从外地输入。抗日战争前,上海、武汉、江西、重庆、成都等地的棉纱、疋头、百货、呢绒、绸缎、纸烟、瓷器,西药等百余种日用工业品,年输入量 10 万余担(因计量单位不同,系按重量折算)。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宜宾开始出现了造纸、化工、电力等工业生产部门。继后,陆续办起了火柴、织造、肥皂、电池、皮革制品等生产厂。

50 年代以后,经过 39 年的建设,宜宾已发展成为有 35 个门类的新兴工业城市。特别是酿酒工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宜宾酿酒历史已有 2000 余年,早在唐、宋时期已酿出官定名酒重碧酒和荔枝绿。明代用五种粮食(高粱、梗稻、糯米、玉米、荞麦)配方酿出一批优质酒。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五粮液酒的前身“杂粮酒”。民国 4 年,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获金奖。民国 21 年,以五粮液名称正式注册,销往国外。30 年代中期,宜宾酿酒糟坊发展到 14 家,窖池 144 口。1953 年,市内所有私人

小糟坊联合组建成宜宾酒厂。1957 年,正式更名为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1976 年,职工 280 人,年产量为 600 吨。改革开放以后,截至 1988 年,国家先后投资 11070 万元,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全厂形成生产能力上万吨,职工增至 2356 人,年产量达到 5840 吨。五粮液酒厂已成为生产、销售、科研、检测、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大型企业。五粮液曾连续四次评为全国名酒,荣获金奖。

宜宾地区以五粮液为龙头,商办工业为主体的酿酒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除五粮液系列酒外,还有叙府大曲和红楼梦、故宫液、通灵液等部、省优酒 40 余种。1988 年,全区已有酿酒厂 717 个,生产能力 10 万余吨,产量 5.7 万吨,总产值达 1 亿元。

宜宾纸厂和长江纸厂生产的新闻纸、牛皮纸、书写纸、纸袋纸以及其他工业用纸调供全国各地,年产量 10 万吨左右,是全国闻名的大型纸厂之一。其他化工、机械、电力、轻纺、建材等工业也都有较大的发展。1988 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已达 9.4 亿元,比 1979 年增加 78.4%,商业日用工业品购进总值为 2.35 亿元,比 1979 年增加 91.6%,日用工业品批发销售 2.02 亿

元,比1979年增加122.7%。其中,销

往全国各地的各种酒5万余吨。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解放前,宜宾集散的物资种类多,数量大,商业、饮食服务业的网点遍布全城,并有一批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主要有粮食市场6个,油脂市场1个,食糖市场2个,山货药材市场1个,花纱布市场1个,竹木1市场个。还有“火神楼”、“忠恕恒”、“留园”等茶馆,均为洽谈交易的场所。

宜宾山货药材市场位于栈房街,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民国时期,曾有20多家山货行栈堆货住客,从事交易活动。栈房街市场,既是宜宾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全城商贸活动的中心。外地客商和本地商户大多每天赶市,参加“茶哨”,进行交易活动。商业银行和运输行业则派人参加,为交易办理信贷和运输事宜。市场交易范围很广,不仅有山货、药材、土产等,还有粮食、油脂、花纱布、五金和其他各类商品。栈房街来往商人川流不息,进出货物接连不断。各行栈的算盘声、银钱声深夜不止。街上卖汤元、小吃的通宵达旦。栈房街市场对外很有声望,是闻名远近的商场,对全城商业贸易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

解放前的商业以小商小贩和小型店铺为多,著名的有:五金行业的“廖

广东,织造行业的“中和厂”,百货行业的“美伦”,丝绸疋头行业的“谦复恒”等。著名的大型的民族资本商业“宝元通”也是由小商户发展起来的。该企业是民国9年由肖则可等人在宜宾创办。开始经营铁锅,以后经营针纺、百货、文化用品等,其分支机构逐步扩展到南溪、江安、泸州、重庆、成都、昆明、上海、九龙、香港、新加坡等地。

1950年,国家在没收官僚资本和赎买民族资本商业“宝元通”的基础上,在宜宾先后建立了百货、五交化、糖业烟酒、食品、煤业建筑、石油、蔬菜饮食服务、工矿等专业公司或采购供应站,以及宜宾肉类联合加工厂。对私营商业和小商小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分别归口由各专业公司领导和管理。国营商业领导下的计划市场形成后,集市贸易逐渐衰退。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流通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三多一少”商品流通体制逐步形成,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指引下,各类商业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至1988年底,国营工商业新建和改造了五粮液经贸大厦、名城大厦、百货大楼、翠屏商场、

东街商场等商场,全市共有国营商业经营网点 471 个,从业人员 5690 人,分别比 1979 年增长 6.2%、41.5%。集体商业 101 个,从业人员 1884 人。私营、个体商业达 6901 人。在市内恢复和新建了综合农贸市场 8 个,中心路小百货批发市场 1 个,日用工业品和副食杂品摊区 10 余处,以及东街夜市等。集市贸易成交额已达 2562 万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4.85 亿元,比 1979 年增长 3.06 倍。

在放开搞活国内商品流通的同时,宜宾对外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88 年,外贸出口总值达 9475 万元,比 1979 年增加近两倍。出口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柑桔、烟和肉类、香料油、竹簧、药材、纸张和复制品、电冰箱、电子元(器)件、扬声器等 100 多

种,销往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竹海天下翠”、“石林天下奇”、“悬棺天下谜”等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命名,在旅游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和经济交往不断扩大的推动下,饮食服务行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商业系统外,机关、部队、学校,厂矿都先后改造和新建了一批高中档餐厅和宾馆。如“酒都饭店”、“叙州宾馆”、“经贸大厦宾馆”、“建工大厦”、“五粮液酒家”等。拥有床位一万余张,接待中外游客逐年增加。1987 年“万里长江第一城”经济协作和物资交流会接待了上万人次。宜宾的风味小吃、宜宾燃面、怪味鸡等已被省评为名小吃。小型饮食摊点、烧腊摊子、发廊等饮食服务行业到处可见,市场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

第八章 川西南物资集散地——乐山市场

乐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汇流处,经济文化开发较早,历史上是川西南物资集散地。

乐山为古蜀发祥地之一。秦置南安县,唐代设嘉州,南宋设嘉定府,康熙十二年置乐山县。1949年底乐山解放后,为专员公署所在地。1979年5月设县级市,同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1981年定为国家级风景旅游区,是驰名中外的旅游名城。1981年10月,乐山市与日本国千叶县市川市结成友好城市。1985年,乐山地区撤销,设立省辖市。全市辖4个区(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区、金口河区),11个县、市(峨眉山市和仁寿、眉山、犍为、井研、夹江、洪雅、彭山、沐川、青神、丹棱县)和两个彝族自治县(峨边、马边)。总面积20013平方公里,总人口643万。市中区面积825.2平方公里,人口47.8万。全市共有27个民

族,少数民族有9.4万人,少数民族中彝族人口较多。

50年代开始,随着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公路建设发展,乐山交通运输由水运为主转为陆运为主。1987年,全市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线路总长6144公里,比1949年增长6.78倍。连贯我国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横跨市内彭山、眉山、夹江、峨眉、沙湾、峨边、金口河等县、市、区,营运里程209公里,年通过能力860万吨。以市中区为中心,乐成(成都)、乐内(内江)、乐西(西昌)、五新(五通桥至新市镇)等公路干线,与川西南各市、地连接,支线伸至乐山境内各地。公路总长5236公里,比1949年增长16.8倍。通航河流12条,水运里程699公里,上行成都、雅安,下至宜宾、重庆。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相结合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市场繁荣兴

旺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解放前,乐山是川西南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市场,周围各县的农副产品多通过乐山向外销售。民国 36 年,集中乐山输出的主要物资有,蚕丝 1500 担,白蜡 2500 担,茶叶 750 担,猪鬃 480 担,羊皮 550 担,沙金 500 余市两。常年输入的主要物资有,大米 17 万余担,棉花 2000 余担。

蚕丝。乐山盛产蚕丝,20 年代为兴盛时期,年产约六七千担。30 年代年产量减为二三千担。除乐山本县所产外,岷江流域的眉山、彭山、青神、夹江、雅安、洪雅、峨眉、犍为及临近的荣县等地的蚕丝大多运至乐山销售或外运。乐山是四川蚕丝的重要集散地。民国 28 年以前,集中乐山市场交易的蚕丝每年 1800 担左右(包括来自宜宾、筠连、三台、梓潼等地的蚕丝约 400 担)。进入乐山市场的蚕丝,部分销售境内绸厂、机户织绸,部分运销成都,每年约 500 担。民国 32 年前,经过缅甸外销出口,每年 500 多担。以后,经印度出口英、美,经西北出口苏联等国家。乐山市蚕茧产量,1949 至 1987 年增长 11.26 倍。目前,仅乐山丝绸厂的产品已发展到 30 种,双绉电力纺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白厂丝、优级土丝产

品直接出口,运销日本、苏联和西欧、阿拉伯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白蜡。乐山既为白蜡产地之一,也是白蜡的较大集散市场。乐山的白马、土主、苏稽、符溪等乡的白蜡年产量约 1800 担。岷江流域的洪雅、峨眉等地所产白蜡,多以乐山为销售市场,销往成都、重庆、武汉、上海、昆明等地。民国元年至 5 年为 4340 担,民国 28 至 29 年为 1980 担。抗日战争期间,长江航运阻塞,经营日衰。50 年代初期,生产发展。“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产量锐减。近几年又开始回升。1988 年,全市产量 796 担,调往省外 627 担,主要销北京、天津、上海。

茶叶。乐山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市内彭山县是全国最早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全市茶园面积,1972 年 2 万多亩,1987 年发展到达 11.92 万亩。1988 年,收购 4139 吨,销售 2663 吨,分别比 1979 年增长 1.47 倍和 6.15 倍。名茶竹叶青,1985 年在葡萄牙里斯本 24 届世界品评会上荣获国际金奖,出口量不断扩大。水果。以柑桔为主,栽培历史悠久。全市有柑桔园 28 万亩,年产量达 6 万吨。1987 年,销售 3.37 万吨,主要销往东北、华北、西北,对外出

11 2800 吨

生猪。乐山是四川省外调猪肉的主要基地之一。全市 1988 年末存栏 466.4 万头, 比 1978 年增长 2.6 倍,

出栏 418.9 万头, 产值 4.8 亿元。1974 年建成 1500 吨的乐山肉联厂, 5000 吨的眉山肉联厂在 1989 年建成。全市共有冻库 13 座, 库容量 10050 吨。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乐山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 在明、清时期, 纺织、造纸、制盐、铸锅和采煤业已有较大发展。嘉定丝绸运销省内外。生活用锅和食盐销往云、贵、康、藏和两湖地区。20 世纪初, 先后开办了丝厂、纸厂、火柴厂等轻工业。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沿海工业迁入乐山, 促进了乐山工业的发展。60 年代中期, 随着成昆铁路通车, 以电力、原材料工业和专业机电产品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工程, 沿铁路沿线展开。目前, 全市已有电力、煤炭、食品、纺织等 14 个工业门类。乐山电力工业在四川主力电网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原材料工业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 不少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

50 年代开始, 乐山的食品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78 年以后, 对彭山曲酒厂和乐山全华酿造厂进行了技术改造。1984 年建成年产 3300 吨的乐山啤酒厂。1987 年, 全市商办工业包括肉食、禽蛋、酿酒、酿造、糖果糕点等类, 年产值 5 亿多元。产品除供应当地外, 并销往省内外各地。荣获部、省优

质产品的有彭祖头曲、峨秀牌特曲、桥牌豆腐乳、夹江豆腐乳、乐山牌香油米花糖、凤凰牌酥芙蓉等 22 个品种。1988 年, 乐山食盐的产量达 49.03 万吨, 除供应本市外, 还销往省内部分地区。

1987 年, 全市共有造纸及纸制品工业企业 92 个, 产值 1.49 亿元, 比 1978 年增长 1.8 倍。夹江手工国画纸颇负盛名, 清代曾列为贡纸, 1983 年命名为“大千书画纸”, 1987 年获部优产品称号, 年产量达 600 吨, 一部分销往日本、联邦德国、新加坡和港澳地区。

乐山的毛丝纺织有较大发展, 川康毛纺织厂是全国粗梳毛纺基地之一。该厂生产的毛呢、毛毯畅销省内外, 远销北美、东欧和亚非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

1988 年, 全市工业总产值 40.99 亿元, 比 1959 年增长 17.7 倍, 比 1979 年增长 1.67 倍。产品不断增加, 流通规模扩大。1988 年, 全市商业购进工业品 3.22 亿元, 比 1979 年增长

1.46 倍。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乐山发展了同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已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形成联合体 12 个,联合企业 151 个。商业在北京、云南、厦门、广州、吉林等省、市开设各类贸易窗口 14 个。

1987 年开始举办国际龙舟经济交易会,共接待全国 2056 个经贸代表团,吸收了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旅游者、新闻官员和记者 1056 人,提高了乐山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为经济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定条件。

城乡通开,多渠道经营,集市贸易迅速发展。1988 年全市城乡集市面积达到 56 万 m^2 ,比 1985 年 47.3 m^2 增长 18.6%。集市贸易成交总额 9.08 亿元,比 1985 年 4.72 亿元增长 92.37%。

流通畅旺,市场繁荣。1988 年乐山市社会商品购买力 28.2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5.6 倍。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零售网点 93812 个,从业人员 170968 人,平均每万人口有商饮服务网点 146 个,从业人员 266 人。

乐山风景秀丽,名胜景点多。全市文物保护单位 296 处,其中列为国家级 4 处、省级 13 处。馆藏文物两万多

件,以乐山大佛和仙山峨眉为轴心,一个星罗棋布的旅游网络辐射全市,把游泳之乡五通桥、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的沙湾旧居、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里眉山三苏祠、以及仁寿黑龙潭水库、夹江千佛岩、青神中岩寺、平羌小三峡、洪雅瓦屋山、犍为罗城古镇等名胜连成一片,组成了纵横岷江中下游的旅游网。全市 1988 年接待国外游客 2.4 万多人,国际旅游收入 195 万元,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480 万人,国内旅游收入 667 万元。

乐山旅游业的兴起,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1979 年后,乐山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档宾馆、饭店,如嘉州宾馆、东风饭店等。1987 年,全市已有 6 万多床位,其中带卫生间的标准床位 1700 多个。1983 年后,峨眉山的农民服务业蓬勃发展。1987 年,全市各种类型的旅馆、宾馆、招待所和农家旅店有 200 家以上,形成年接待能力 200 万人次的服务网络。乐山传统佳肴、地方风味小食甚多,有清蒸江团、糖醋脆皮鱼、雪魔芋烧凤翅、周鸡肉、西坝豆腐、东坡肘子、珍珠元子、银丝细面等数十种。1988 年,全市饮食业营业额 1.19 亿元,比 1979 年增长

2.68 倍。

乐山旅游业的兴起,带动了工艺美术品的发展,1980 至 1987 年生产企业由 15 个增至近 100 个,生产的旅游产品花色品种由 250 多个增至 1500 多个,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赞扬。旅游业已成为乐山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乐山市场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开始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和相当发达的经济、科技实力,旅游资源初步开发,交通较为发达,正向着开放型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以新兴工业和旅游业为特点的多功能城市转化。

第九章 川藏物资集散地——雅安市场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缘、青衣江畔,扼川滇、川藏咽喉,是传统的川藏物资集散市场。

雅安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秦汉属严道县,隋朝以后是雅州(郡)府所在地。民国时期,先隶属四川省。民国28年1月建西康省后,属西康管辖。西康省会设在雅安,1948年迁康定。1950年西康省会改设雅安。1955年10月西康省并入四川。雅安为雅安专员公署驻地。1983年,撤县

建市,为雅安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全市面积1061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28.9万,其中非农业人口9.59万。

民国时期,雅安交通,有康滇公路(川滇西路),川康公路(成都—康定)青衣江水运,担负商贸物资运输。1950年后,先后建成川藏、川滇和夹(江)雅(安)公路,东通乐山,西去拉萨、西宁,南达渡口、昆明,北至成都。至今雅安仍是西藏东南部和甘孜州藏区通往祖国东南部的唯一陆上通道。

第一节 汉藏贸易往来

在历史上,雅安是藏区与汉区进行茶马互市和土特产品贸易市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至1398年)的南关(今飞机坝),曾是盛极一时的茶马市场。

明清时期,雅安边茶加工运销业兴盛。清末民初尚有茶帮30余家,后因印茶侵销,茶叶贸易衰落,解放前夕仅存13家。

民国时期,商人往返于汉藏地区,

主要将茶、盐、布、绸缎、酒、铁器等运往康定，再将藏区的皮毛、山货、药材等运抵雅安。尽管商业盛衰更迭，但茶叶一直为雅安输出之大宗。茶叶贸易衰落时，每年销藏区边茶仍达10万余市斤，价值200万元。汉藏交易，主要通过“锅庄”（即行栈）进行。康定的“锅庄”最多时曾达48家。交易方式多为以物易物，如边茶换藏马、皮毛、药材、黄金等。此种交易方式一直延续到雅安解放初期。

由于汉藏商贸发达，来往客商较多，雅安的饮食服务业亦随之兴旺。民国31年，饮食业发展到153家，旅栈业119家，驮运马栈业22家，大大小小的茶馆遍布全城。

50年代开始，藏区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国家对大多数商品实行计划

管理，商品调拨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加之交通运输发展后，藏区的土特产品可直运成、渝等地，不再经过雅安集散中转，雅安只是运输的必经要道。仅甘孜州商业局在雅安设有采购站，每年中转商品价值四五百万元，其中部分为雅安地方产品，如皮鞋、糖果糕点、酒、调味品等。但是，雅安边茶仍源源不断销往藏区各地。80年代，逐步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与技术协作，青海玉树商业局于1986年在雅安建立采购站。雅安在青海、西藏、内蒙等地购进大量皮张，引进资金，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交流人才，并互设商品销售点10余家，形成了一个跨省区、开放式的区域市场，促进了汉藏民族团结和边疆、内地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历史上，雅安是川康两省商品输入输出的枢纽，集散的大宗商品除茶叶、马匹外，还有药材、畜产品、木材、粮油、烟等。

药材。雅安曾是四川七大药材市场之一，西康所辖康属（即康定府所属地区）、宁属（即宁远府所属地区）、雅属（即雅州府所属地区）和西藏各地的药材均在此集散。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药材品种有140余种，大宗的药材有

虫草、贝母、天麻、鹿茸、麝香、大黄、木香牛膝等，尤以黄连最为珍贵（北宋《太平寰宇记》称“雅产，名曰雅连，甲于天下。”）《雅安县志·物产篇》记载：“黄连尤著，清岁贡二十一斤。”民国20年（1931年）前后，药材贸易兴旺，仅天全县的牛膝每年运抵雅安的即有10万余市斤。据1930年《康定运销内地商品年贸易额调查》记载：麝香0.5万市斤、虫草0.93万市斤、知母

22.81 万市斤、贝母 12.21 万市斤、鹿茸 2.82 万市斤、秦艽 0.26 万市斤、大黄 187.75 万市斤、羌活 1.43 万市斤。民国初年有药材商 10 余户，民国 31 年有 22 户，解放前夕仅存 6 户。

木材。抗日战争前，木材采伐多系自用。抗日战争期间，雅安成为青衣江流域的主要木材市场。民国 27 至 31 年，每年约输出木材 4 万 m^3 。

畜产品。民国时期中转输出的畜产品主要有牛羊皮、羊毛、猪鬃等。据民国 29 年《贸易月刊》二卷第三期载：“羊毛为西康重要特产之一，由重庆外销之炉（即打箭炉，今康定）毛历年经雅安运销的数量最高达二百万斤，平均数量不低于一百万斤”。第八期载：“集中于雅安之猪毛，每年平均为五十担，最高数量达六十担，最低不少于三十担，多数为转运。”牛羊皮经雅安年中转输出 10 万余张，价值 10 万余元。

粮食。民国初年有粮商 35 户，民国 31 年增至 56 家。抗日战争前，各条商路往来无阻，仅城区的新市区“新马路”米粮市，每天即成交大米 50 余石。城区和草坝两处，每年粮食成交量约 3 万余石。粮食多数购自名山、新津、邛崃、洪雅等县，除供应雅安城区外，主要销往康属。

油料。民国 25 年有油商 12 户，民国 31 年有 24 户，1949 年增至 62 户。主要经营菜油。除收购雅安四乡零油

外，主要购自崇庆、温江、名山、乐山、洪雅等县，销往康属、宁属。

特货（鸦片烟）。40 年代的雅安是仅次于丰都、涪陵的烟土大市场。云南的南土、宁属的盐边土和康属的炉霍土运入四川内销的，大部分以雅安为集散地。官土每月交易最多则 20 余担（1 担为 1000 两），少则为 10 余担。后虽明令禁种禁售，但私下交易从未间断，每年私贩运销数量仍有千余担，而且一直延续到雅安解放前夕。

历史上，雅安农业以种植粮食为主，亩产仅 96 公斤。解放后，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副业产品日益丰富。1988 年，农业总产值 8282 万元，比 1949 年的 778 万元增长 9.7 倍，粮食亩产达 300 公斤。1988 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 4587 万元，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量为：粮食 1210 万公斤，菜籽 125 万公斤。畜产品：猪鬃、猪肠衣、兔羊毛、猪皮、牛皮等收购总值 600 万元；调出猪肠衣 5.3 万根，猪革皮 20.8 万张，山羊皮 18 吨，猪鬃 179 箱。生猪收购 22 万头，调出 8.5 万头。木材调出 2.89 万 m^3 。蚕茧收购 37.3 吨。药材收购总值 1300 万元，主要品种有：天麻 0.24 万公斤，大黄 18.79 万公斤，当归 2.02 万公斤，黄芪 13.23 万公斤，牛膝 75.82 万公斤等。1978 年引进北方奶山羊。1988 年收购鲜奶 200 万公斤，生产奶粉 227 吨。

第三节 工业品购销

历史上,雅安工业非常落后,1919年后才逐步建立起一些边茶加工厂、小纸厂、小煤窑以及一些手工业作坊。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293.78万元,主要工业品有南路边茶1450吨,原煤2138吨,皮鞋0.10万双。市场上的布、盐、糖、酒、百货、五金等商品均依赖外埠供给。

茶:雅安种植加工茶叶有两千年历史,是四川古老茶区之一。历史上最早的名茶“蒙顶茶”的产地蒙山,地跨名山、雅安两地。唐朝黎阳王“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诗句流传至今。雅安茶叶古为贡品。《雅安县志》载:皇茶园七株茶,“清定岁正贡八两”。在全国享有盛名,有“凡蜀茶皆比雅州蒙山”之誉。茶叶是藏族同胞生活的必需品,是雅安输出之大宗。1939年6月《四川月报》载:“民国26年雅安茶叶产量为二万担(折合二百万市斤),每担价值42.50元,总价85万元。”民国31年《贸易月刊》7月号载,雅安1911年至1936年的茶叶销量为:1911年30万包,1921年25万包,1931年22万包,1936年20万包(每包大小不一,重量16至18市斤不等)。解放后,茶叶种植和加工有了很大发展。1988年茶叶加工7580吨,历史名茶已得到

恢复和发展,而且培育了新的名茶。在1983年全国边茶工作会议上,康砖茶、金尖茶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奖,雅安被列为四川省12个边茶生产基地之一。细茶峨眉毛峰,1982年、1983年分别被商业部、农牧渔业部评为全国名茶。1985年9月参加葡萄牙里斯本第24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获金质奖,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香港和国内京、津等城市。雅安毛峰,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获四川省优质名茶奖。现在,雅安已成为年产5万担茶叶的基地市,边茶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1/6,产品远销省内藏区和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

纸:民国14年前,全城有土纸槽户60余家。民国27年建造纸厂,生产新闻纸、对方纸,供应成都《中央日报》等单位和本城边茶包装使用。年产纸百余吨,生产总值20余万元。手工作坊生产的土纸、迷信用纸运销康属、宁属,畅销不衰。

火柴:民国8年建立星星火柴厂。民国32年改良火柴制法,年产醒狮牌火柴100大箱,飞狮牌300大箱,除供应本城外,还运销康属、宁属。50年代初,该厂仍继续生产。

皮革:民国28年前,雅安只有数

家火秋皮手工作坊。后建制革厂,年生产能力为皮鞋 3000 双,轻革 1 万 m^2 、重革 50 吨。但是,大多数时期处于半停产状态。

煤:民国初年始有私人开办炭场。据民国 28 年《四川经济月刊》8 期记载,“雅安煤总产量 20 万斤,价值 3000 元”。平均每日上市量 200 余背,供城区民用。

铁:民国 29 年成立西康铁业公司前,系私人土法开采冶炼。据《雅安文史资料》第一辑载,民国 30 至 31 年,该公司销售铁锅 2500 担,价值 50 万元,土铁 1000 担,价值 12 万元。当时市场上的主要品种有铁锅、炉桥、犁铧、土钢等,除满足本城需要外,还运销川西平原、川南部分地区及康属、宁属。

在雅安市场集散中转的主要商品还有:

食盐:民国时期主要销售乐山、牛华溪所产的花盐、巴盐。民国 25 年前为自由运销。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确保税收,实行“统运统销”。雅安每年认销盐额为 28“引”(每引为 8834 市斤)。小部分销售本城,大部分运销康属、宁属。民国初年有盐商 10 余家,后陆续增至 62 家。

糖酒:民国 23 年前后,有糖酒商 30 余户,1949 年仅存 11 户。主要运销犍为红糖、内江白糖、冰糖、叙府大曲、成都大曲、邛崃冷气酒、汉源九襄高粱

酒等。年输入糖酒 100 余万市斤,除销售本城外,还运销康属、宁属。每年藏区都有马帮来采购糖酒,每次约有 80 至 100 匹马。

匹头:民国时期经营匹头的有 20 余家,主要运销湖北沙市、宜昌、汉口的广布(宽布)和大邑唐场窄布(长 28 市尺、宽 1.2 市尺的土布),乐山、夹江、南充等地绸缎。据《康定县图志》载,内地汉商运销康定商品年成交广布、土布 10 万匹,合 18 万元,绸缎 2 万匹,合 10 万元(银元)。

50 年代开始,工业企业逐步增多,产值稳步上升。“三五”计划期间,五家军工企业内迁雅安,带动了地方工业发展。现在,雅安已拥有冶金、电力、煤炭、机械、建材等十多个行业。

1988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34950 万元,主要产品有:制革 41 万张,轻革 97 万 m^2 ,重革 826 吨,机制纸、纸板 9000 吨,合成氨 13711 吨,炸药 7289 吨。出口皮鞋 63.4 万双,远销澳大利亚、美国、德国、中东和澳门等地。6Y—95 型螺旋榨油机,1985 年获部优产品称号,1988 年产 1839 台,已打入国际市场。J40 型事故勘查车和 J214 型越野车,1988 年产 1350 辆,畅销国内各省市自治区。505 型、506 型云母纸电容器获部优称号,远销美国、法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办工业的发展。1988 年,商办工业总产值达

5503 万元,主要产品产量:酒类 13005 吨,糖果糕点 3168 吨,酿造调味品 1211 吨。羌江牌猕猴桃果酱、全脂奶粉分别在 1985 年、1987 年获商业部、

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肉联厂有冻库容量 1800 吨,年加工生猪 10.9 万头,品种 48 个,远销京、津、穗等地。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解放前的雅安商业,随着政局和社会情况的变迁而盛衰起伏。抗日战争前,市场交易盛极一时。抗日战争期间,外销数量减少,仅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等少数药材尚有销路,羊毛、牛羊皮十分滞销。羊毛年仅能运出 6 至 7 万市斤,价格由战前每百斤 32 元剧跌至 16 至 17 元。民国 29 年,全城贸易总额仅五六百万元,且为现钱交易,而盐茶交易多为以物易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商户倒闭甚多。1949 年,全市 32 个行业仅存商户 1255 户,从业人员 2090 人。市场萧条,交易冷落。

历史上,雅安商品集散主要有四条商路:东路,经青衣江至乐山、宜宾、重庆等地;南路,经荥经过汉源至西昌到云南;西路,经荥经、汉源至泸定、康定或过天全、泸定到康定;北路,经名山、邛崃、新津至成都。解放后有大量物资通过成昆铁路中转。1978 年商业、供销、粮食、医药等系统在成昆线上距雅安 125 公里的青龙场火车站相继建立了八个转运站。1988 年货物中转量达 25 万吨。输入的大宗商品有石

油、化肥、农药、糖、烟、粮食等。石油输入量最大,年均 5 万余吨。输出的主要商品为酒、纸张、副食、竹木等。百货、五金等日用工业品仍以成都为主,要经中转站转运。

解放前,雅安商品交易分大市、小市。小市为数量不大而品种繁多的各类生产、生活资料在一定市场的交易。民国时期商贸兴盛时有集贸市场 22 个,40 年代末减少至 17 个。大市为大宗商品如药材、粮油、土布等类物资的成批交易,多在被指定或公认的茶铺、旅店、行栈进行。民国时期,商号店铺集中大什字口(今大北街),以后逐渐迁至城门口(今文化路)闹市区。解放后,逐步发展至朝阳街、华兴街一带。1956 年后延伸至河北辖区。现今,东西城辖区的主要街道及河北辖区的挺进路一带已发展成商店林立的繁华商业区。

交易形式,历史上盛行城隍会、观音会等庙会交易,而以年年举办的城隍会最为庄隆重,会期长达一月。50 年代,人民政府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赋予其新的生活色彩。从 1951 年起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在人民广场和朝阳街口一带举办物资交流会。1953 年举办的西康省物资交流会参会人数达 20 万人次,其中上海、天津、沙市、武汉等省内外各地代表 300 余人。还收购到平时不易收到的青贝、炉贝、天麻、牛膝等药材上万市斤。60 年代后,交流会一度中断。80 年代,交流会再度兴起。1988 年的物资交流会,参会的有 36 个省市县的 150 多个企业单位和个体户 1000 余户,人数达 55 万人次,不仅进行了商品购销活动,而且还引

进了资金,协进、协出了钢材等物资,为繁荣雅安起了多功能作用。

雅安过去是川藏物资集散地和中转地。50 年代开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的作用发生变化,除中转商品外,有越来越多的本地商品要向外销售,市场日趋兴旺发达。1988 年,全城社会商业网点增至 5089 户,从业人员 11244 人,集贸市场达 32 个,其中专业市场 12 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22230 万元,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达 3463 万元。

第十章 电子工业城市——绵阳市场

绵阳位居川陕要津,滨涪江、安昌河两岸,北倚剑门雄关,南接成都平原,自古有“剑门锁钥,蜀道咽喉”之誉。历史上是川西北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现为电子工业城市和科技基地。

绵阳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置涪县,晋名涪城,隋初置巴西郡,开皇置绵州,清升为直隶州,是历代州、郡治所。民国24年(1935年)为四川省第十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地。50年代,设绵阳专区,辖10县。1953年和1958年,先后与广元遂宁两专区合并,辖19县,号称南北一千里,人口一千万的全国最大专区。1983年,分设德阳市。1985年,撤销绵阳地区,分设遂宁、广元、绵阳三个省辖市。绵阳市辖6县1市1区(安县、梓潼、平武、北川、三台、盐亭县、江油市、绵阳市中

区),并代管省属科学城办事处。全市面积20249平方公里,市中区面积1570.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23平方公里。全市人口485万,市中区87.86万,其中非农业人口25.07万。

绵阳交通便利,宝成铁路纵贯全境。川陕、绵渝、绵南(坪)、绵茂(汶)、绵中(江)等五条国道、省道在市区交汇,绵阳港是涪江木船的航运起点。所谓“陆通于蜀,水通于巴”,自古为“舟车辐辏,商贾云集”之地。

清代,省外客商在绵阳城内相继建立陕西、江西、湖广等会馆,为客籍商人联谊、聚会之所。绵阳市场的商品已东达重庆,南及成都,西至龙门山区、阿坝草原,北至剑阁、广元,延伸陕甘两省。解放以后,绵阳的市场有更快的发展。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绵阳乃山区、丘陵、平坝之交汇处,邻县农副产品、山货、药材多集散于此。安县、罗江、彭明、江油的大米及邻近各县的棉花,在此汇集,沿涪江运往下游三台、太和、遂宁等城镇销售。中坝的中药材,松潘的皮毛,经绵阳由水路运销重庆。平武、北川的生漆、桐油、核桃、木耳、木材、茶叶多在绵阳成交,销往德阳、广汉、成都等地。陕甘两省的皮毛、中药材也由绵阳转口,销往省内外。

绵阳输出的农副产品有:中药材、蚕茧、粮食、食油、猪鬃、桐油、牛羊皮、肠衣等,以中药材、蚕茧、粮食为主,猪鬃、桐油次之。中药材中的麦冬,是绵阳特产,销往全国各地,出口东南亚。清宣统二年(1910年),输出麦冬值白银15.2万两,牛羊皮等山货值白银1万两。

民国时期商品经济活跃,1928~1934年为农副产品输出旺盛期。年输出大米10万市石,麦冬4000~5000市担,杂粮输出值银元40万元,蚕茧3000市担,桐油1.2万市担,猪鬃300余市担,食油1万市担。输入农副产品约为200~300万元。民国23年以后,集散商品开始衰落,输出输入下降。民国27年,输出大米下降至6~7万市

石,麦冬下降至3000市担,输出杂粮值银元仅20~30万元。输入转销商品只有70~80万元。抗日战争时期,军需民食需粮较多,彭明、江油、安县等地的米粮运至绵阳集散。民国30年米粮市场日渐繁荣,涪江、安昌河船只载运的粮食均在此接卸转运和交易,年交易量约7万市石,形成川西北米粮、食油最大的集散市场。民国37年集散商品继续减少,大米输出967市石,麦冬450市担。

50年代开始,随着宝成铁路的通车,沿铁路各县,有的商品直接从铁路运出,绵阳集散物资减少。由于绵阳农副产品生产有很大增长,输出商品总量仍在增加。1954年麦冬产量达1.3万市担,行销全国并出口。50年代,年产生姜约7万市担,上市5万余市担,远销东北、华北、西北地区。1965年,蚕桑生产发展,收购蚕茧1.65万市担。1976年发展黄红麻生产,1979年收购3万市担,并进入国际市场。1988年收购量上升至6.54万市担。1988年,农副产品输出总值1.3亿元,其中:粮油5488万元,肉食禽蛋4498万元,中药材2265万元,麻类及土产品等794万元。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解放前,绵阳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产品为丝、食盐、土布等,均以手工操作为主。日用百货靠成渝两地供给。

绵阳得名为“绵”,实因其为四川蚕丝、丝织品产地。唐开元贡赋均有白紵、绢、双紵、绵等丝织品。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蚕桑业有较快发展,手工业作坊大量出现,所产黄、白丝以坠力强、韧性好著称。同治、光绪年间,绵阳一度为四川蚕丝销售中心,邻近的彭明、江油、平武、梓潼、剑阁、昭化、广元等地所产之丝,均汇集绵阳运销国内外,总名为“绵丝”。顺庆(南充)、保宁(阆中)、潼川(三台)等地生丝,运销上海,均冠以“绵”字头,称“顺绵”、“保绵”、“潼绵”,驰名于成都、上海市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生丝年销售近千把(一把84两)。清宣统二年(1910年),生丝运销成都3780把,运重庆转口国外97箱。民国初年,绵阳年产生丝3500市担,连同邻近各县输入共5000市担,销成都、乐山等地300市担,运销上海出口4700市担,值银元100万元。民国6年(1917年)日本生丝倾销上海,绵阳生丝出口锐减,产量不足2千市担。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生丝出口停顿,产量减至100市担,从此一蹶

不振,直至1949年仍未恢复。

食盐。历史上绵阳是川西主要食盐产区。民国时期,年产量约10万市担,销往川西北16个县以及陕西汉中、甘肃文县等地,年输出约9万余市担。50年代,因宝成铁路之便,自贡食盐输入,绵阳食盐土法生产,工艺落后,成本高,于60年代停产。

土布。民国时期,土布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产品,约有土织布机800余台,年产土布8000多疋,销往广元、剑阁、北川等县。50年代,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土布生产逐渐停产消失。

1949年,绵阳仅有小手工业作坊111家,年产值480万元。产品有食盐、生丝、土布、酒、酿造品、线袜、竹筷、布伞、铁工具等。除竹筷销往陕甘两省外,其余产品运销邻近各县和本地农村。

50年代,绵阳工业逐步发展。电子工业开始建立,地方工业的缫丝、农机、造纸,化工工业相继建成。60年代,国家三线建设开始,绵阳(当时辖19县)成为全省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共建地属以上厂矿130个,其中中央厂矿和科研单位60个,新增职工和家属4万人。为做好人民生活供应,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建成肉类联合加工厂。

1979 年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引进先进设备,改造和完善原有工业,大力发展战略性、轻纺、机械、食品工业。历年创国、部、省优质产品 79 个。1988 年工业产值 20.95 亿元,其中,电子工业产值 10.9 亿元,占全省电子行业总产值 1/3,初步形成以电子工业为主,机械、轻纺、食品、化工为支柱的工业体系,被誉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电子工业。主要产品有电视机、声控音响设备、电讯元器件、雷达、计算机、电子医疗仪器、民用电器等。长虹牌电视机于 1979 年投产,1988 年生产 55.36 万台(彩电 40.66 万台),商业收购 31.8 万台。其中,长虹牌彩色电视机为国、部优质产品,畅销省内外,并出口国外。

机械工业。主要产品有柴油机、千斤顶、自行车、粮油机械、绝缘材料等。液压千斤顶,1970 年投产后,发展为不同规格的系列产品,获部优产品称号。1988 年,产量 6.59 万台,销售 6.67 万台。其中商业收购 3.9 万台。

轻纺工业。有丝绸、纺织、针织和印染,以丝绸生产为主。1988 年,生产丝 315.2 吨,丝织品 238.39 万米,商业收购量分别是 125.03 吨和 102 万米。

食品工业。有粮油加工制品、饮料、罐头食品、糖果糕点、调味品、酒和冻猪分割肉等。1988 年,产冻猪分割肉 3969 吨,有容量为 1.2 万吨的绵阳

市肉类联合加工厂,每年调运大量冻猪肉供应省外各地。

化工工业。主要产品有合成氨、碳酸氢氨,以及塑料薄膜、塑料制品、肥皂、制革等。1988 年产化肥 10.8 万吨。

工业产品中,部分产品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较大比重,不少产品,如长虹牌彩电、液压千斤顶等畅销全国,出口国外;部分针织品及丝绸产品、冻猪分割肉主要是供应出口,食品中的蘑菇、芦笋罐头,机械产品中的柴油机、千斤顶、花腮钳也部分出口。1988 年全市工农业产品出口创汇 3915 万美元。

50 年代,由于宝成铁路的建成,省外京津沪和省内成渝两地的日用工业品,以及内江、西昌、资阳的糖、酒商品,云南省的卷烟,在绵阳中转分别运往射洪、遂宁、蓬溪、西充、南充、南部、仪陇等地及绵阳市所辖各县。来自广元、旺苍、永川、珙县的煤,经绵阳中转到南边各县。工业品中以煤为大宗,约占 50~80%,副食品的中转以肉食品为主,约有 20 多个县的地产商品由绵阳中转外运。

商品的中转量,以 50 年代末期最高,仅商业局系统每年约为 150 万吨。1969 至 1985 年,年均 130 万吨。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有的商品运输路线有所改变,中转量减少。1988 年中转的工业品为 89 万

吨。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商品流通规模扩大。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59.12亿元,其中市中区23.6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5亿元,其中市中区20559万元。

流通形式灵活多样,发展了工商、农商、商商以及跨地区的多种横向联合。截至1988年,已在北京、广州、云南、西安、陕西、新疆、辽宁及省内各地开辟窗口31个。为了开辟多种市场,扩大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分别于1986年、1987年、1988年的10月份举行了三次秋季商品交易会,参加的展团共90多个,接待了来自浙江、江苏、湖北、黑龙江、河南、广东、广西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省内地、市、州和市内企业6000多家,共3万多人。各届秋交会布设展场1.4万至2.8万m²,展出商品有针纺织品、百货文具、五金交电、电子机械、冶金建材、轻化产品、副食杂品、中西药品、家具和旅游工艺品等1.2万多种,同时开办了资金、人才、劳务、信息、科技设

备、汽车、图书、房地产、药材、木材等专业市场,每天接待群众约10万人次。三届秋交会万商云集,盛况空前。并结合文化艺术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体育运动会。

绵阳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75处,风景名胜区10处,旅游点39处。80年代,旅游事业有很大发展。1988年接待旅游观光人数710万人次,促进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1988年,全市有饮食服务机构2.99万个,营业收入8420万元。

绵阳的城市面貌已发生很大变化。解放初期,绵阳城区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人口2万多。街道狭小,房屋简陋。1988年,城区常住人口25万,面积23平方公里。街道宽阔,高楼林立。城区开发了御营、南河、铁牛、沈家坝四个小区和八个集贸市场。商业网点遍布大街小巷,生意十分兴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川西北的商贸重镇绵阳,将在流通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十一章 川北门户——广元市场

广元地处四川北部边缘,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扼嘉陵江、川陕陆路要冲,是川北门户。古蜀为葭萌地,东晋置兴安县,梁为黎州,宋置利州路。元设广元路。明初为广元府,继改为州,再降为县。清代、民国因之。1950年3月,在广元设立剑阁专员公署,辖昭化、剑阁、青川、平武、北川、江油、旺苍、苍溪、阆中、广元10县。1953年1月改为广元专署;同年3月,并入绵阳专署。1959年3月,昭化县并入广元县。1985年2月,从绵阳地区析出改建为省辖市,辖4县(剑阁、旺苍、青川、苍溪)3区(市中区、朝天区、元坝

区),总面积1.63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4平方公里。1988年总人口283万,其中市中区17.1万。广元是我国西北与西南的交通枢纽,由秦入蜀的咽喉,古代的“金牛道”就经过广元境内。现在宝成、广旺两条铁路在城区交汇;川陕、川甘、广达(县)、广南(充)公路干线分别与陕西汉中、甘肃武都和省内的达县、南充、绵阳等地市相通;境内通航河流有嘉陵江、白龙江、清江河、南河四条,上可通陕西略阳,下可达南充、重庆等地,港口年吞吐量70万吨。

第一节 农副产品集散

广元历来是川、陕、甘三省重要物资集散市场。集散的物资主要是山货、

药材两大类。民国时期,广元就有集市场所70余个,其中建场一千多年的古

老场镇三堆坝,早在川陕公路通车以前,即有闽、豫、晋、鲁、赣、蜀、陕七省客商设庄建立行栈,省内有 21 市县的商人常往三堆坝设点收购各类山货、药材。大宗山货有:黑木耳、桐油、核桃、生漆、柿饼、黄蜡、猪鬃、皮张、棬油、棕片等。药材有:山药、淮牛夕、甘草、枣仁、杜仲、麝香等。市场上交易的农副产品,2/3 来自甘肃的天水、临洮、成县、徽县、武都、文县和陕西的略阳、宁强、勉县、汉中、凤县、宝鸡等地;其余为省内青川等县和广元土产。

黑木耳。民国 26 年前,一般年成交量未超过 60 万市斤。川陕公路通车后,交通便利,货源丰富,年成交量上升至 100 万市斤,主要销往成都、重庆等地。解放以后,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85 年后,年上市量超过 100 万市斤,销往全国各地。1988 年出口国外 6 万多市斤。

桐油。民国 26 年前,一般年成交量 40~50 万市斤。川陕公路通车后,年成交量达 200 万市斤,销往南充、重庆等地。解放后,桐油生产逐步发展。1985 年以后,年上市量达 2000 万市斤,销往全国各地。

核桃。民国 26 年前,一般年成交量 100 万市斤。川陕公路通车后,年成交量达 150 万市斤以上,主要销往成都、重庆等地。解放后,产量逐年上升。

1985 年以后,年上市量近 1000 万市斤,畅销省内外。1986 年后,每年出口核桃仁 40 万市斤。

烟叶。抗日战争前,什邡烟叶经广元销往陕、甘的日运量 1 万市斤以上,每年在 500 万市斤左右。

药材。清末、民国时期,从陕、甘邻近各县流入广元市场的有山药、淮牛夕、甘草、枣仁、柏子仁等,通过广元流向省外的有麦冬、白芷、附片、川芎;往返于广元——重庆的有文党参、当归、大黄、黄芪、胡椒、砂仁、广香、白芍、玄参、杭菊、大香等;地产运销省外的有柴胡、杜仲、麝香等。民国 26 年以前,年集散量 100 至 150 万市斤左右,川陕公路通车后,上升至 200 万市斤。其中,杜仲畅销全国,远销东南亚、日本等地。民国 26 年以前,年销量未超过 10 万市斤,川陕公路通车后,年销量猛增至 50 万市斤。1988 年市场成交量超过 60 万市斤。

粮食。陕西宁强和广元的粮食,通过广元市场,销往南充地区的每年有 500 万市斤。

棉花。抗日战争期间,福生庄经营的棉花,由陕入川,每年 500 万市斤以上,经广元运往成都、重庆。

1988 年,广元市共有农副产品采购供应机构 787 个,4462 人,经营总额 39825 万元。

第二节 工业品购销

清代、民国时期,经过广元中转的商品,4/5由嘉陵江水运,1/5靠古栈道上的马驮人背。中转的工业品,主要有食盐、食糖、煤炭、纸张等。

抗日战争期间,川陕公路的马车、汽车代替人背马驮的运输,工业品的中转量增加50%左右。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在广元设立机构,由水陆转运钨砂、茶砖等外贸物资。甘肃油矿局也在广元设立油站,大量采购重晶石运往玉门油田。50年代后,广元先后建立土产、粮食、百货、花纱布等公司,经营商品的供应范围为青川、剑阁、旺苍、平武、阆中、昭化、江油等县。1953年后,先后成立广元石油站、百货站、五交化站,担负川西北10余县的供应任务。

民国时期,广元商业虽较发达,工业却十分落后。解放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纺织、食品是广元的传统产业,现在生产的纱布、蚕丝、食品等产品,除供应省内外需要外,还有一部分出口创汇。新兴的电子工业产品亦进入国际市场。

食盐。是清代、民国时期广元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由产地南部、阆中经水路运来,20%供应本县,80%销往陕西省南部的9个县和甘肃的文县、武都

等地。广元有盐号20多家,每年经营食盐500万市斤左右。川陕公路通车后,广元市场上每年成交700万市斤以上,盐号也增至50多家。解放后,建立国营盐业机构,主要销售自贡食盐。1965年新建4000m²食盐仓库,负担达县、南充两专区10个县的中转任务,每年100多万担。

煤炭。广元、旺苍生产的煤炭,在川陕公路通车前,年销南充地区8万吨左右。通车后,年销量增至10万吨以上。解放后,广旺矿区煤炭生产逐年上升,1985年输出420万吨,1988年输出量上升到450万吨,主要销往南充、成都及甘肃的文县等地。

食糖。内江产的食糖经广元销往陕甘两省的,每年有60万市斤左右。

纸张。广安、大足、邻水等县所产各种纸张,经广元销往陕、甘两省的,每年有250万市斤左右。

蚕丝。清代,广元出产的山茧远销青海、西藏,年销售金额上万两白银。民国初年,广元生丝销往成都等地,每年2万市斤。1985年,广元产丝100余吨。1988年产丝232吨,出口102.5吨,出口干茧117吨。

棉纱、棉布。民国28年,大华纱厂迁建广元,每年有3000多件纱投放市

场。50年代初,该厂生产的雁塔牌优质纱畅销国内外。1986至1988年,共出口创汇近600万美元。1988年,产纱9600吨,产布2400万米,产值为6500万元,工厂自销纱6232.4吨、布2368.34万米。

食品。50年代后,食品工业发展较快。1974年建成广元肉联厂,冷库容量为1000吨,1988年扩建为3000吨。猪源来自南充、绵阳、达县地区的10多个县。冻猪肉远销全国的20多个省、市。1988年,收宰生猪18.4万头,生产冻猪肉8189吨。食品工业总产值达2.84亿元,生产的粮、油、肉食、罐头、饮料酒等主产品的总产量已

达到76.9万吨,出口创汇额260万美元。

60年代中期兴建的电子工业,1988年已形成年产50万台收录机、60万只录音机芯、300万盒有声磁带的生产能力,全市电子工业总产值达2.06亿元。新星牌、广明牌收录机销往全国各地,华昌片电动启子除为全国2000多厂家采用外,还远销香港、东南亚和欧美地区,每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广元研制的军事电子装备,是电子工业部1985年的优质产品,在国家外贸机构的统一组织下,作为配套产品稳定进入国际市场,1988年创汇500万美元。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广元商业历史悠久。秦蜀贸易往来不断,历代军粮由此转运。宋代曾置转运使,设盐铁监,熙宁十年(1077年),利州的商税额为4.89万贯,居四川州城商税收人的第四位。清乾隆年间,征收商贾各种税款每年达数千两,甚至上万两白银。清末,广元商业兴盛,有中药、酒、水果、金银铜铁等10大商帮从事各种商品经营活动。外地客商先后修建了陕西、湖北等会馆。清光绪二十二年(1906),广元成立商会。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不少客商来此开厂设店,商业繁荣。金融方面,有中

央、中国、交通、农民等18家银行。民国2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指定广元为货物集散市场,各种行栈和商店遍布全城。据民国30年统计,全县共有商家587户,经营药材、山货、棉纱、米粮、油、盐、煤、糖、棉花、五金等商品,年营业额1045亿元(法币)。抗日战争胜利后,商贸日益衰落。解放前夕,广元商业奄奄一息。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广元市场的主要任务是农副产品集散和日用工业品的中转。解放以后,随着广元市工业生产的发展,地产工农业品越来越

多。特别是 1988 年,中共广元市委确定“以商兴市”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商业的迅速发展。1988 年,广元市有商业机构 27968 个,从业人员 56303 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0.7 亿元。

广元历来有举办各种交易会的风俗。民国 14 年,在东山城隍庙举行历时 130 余天的广元劝业会,邀请川、陕、甘三省 20 多个县的八大帮,参会者达 30 多万人次。大会期间还举办了骡马会和耕牛赛会。解放后,从 1953 年起,国营百货、石油、五交化采购供应站,每年都要举行各类商品的供货、补货交易会。1987 年起,广元决定每年举行一次秋季商品物资交易会。当年的秋交会在 10 月举行,设展馆 32

个,展销品种 3.5 万多个。有全国 20 多个省、市 250 多个单位的 3000 名代表参加,广元提供的地方工业品和农副产品达 4000 多个,会期 5 天,商品成交和资金拆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1988 年 9 月,在东坝新区举行秋交会与恢复后的第一个广元女儿节同时进行,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千个工商企业的一万多名代表参会。设展馆 64 个,面积 1.5 万 m^2 ,矿产、茶叶、烟叶、丝绸、猪肉等土特产品成为抢手货,供不应求。这两次秋交会还开设了劳务、科技、信息、图书、金融、外贸、物资、艺术品和房地产等专业市场。秋交会的盛况说明,广元确实是一个物资集散中心,具有相当大的吞吐能力,今后将更加兴旺繁荣。

第十二章 丝绸名城——南充市场

南充位于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自古以盛产丝绸闻名,被誉为丝绸之乡。

南充古为巴子国地。西汉置安汉县,隋改为南充县,唐置果州,南宋置顺庆府,元设顺庆路,明清复置顺庆府,故又有果州、顺庆之称。1950年3月建市,为川北行署所在地。1952年8月川北行署撤销改为县级市,为南充地区专员公署和南充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全市面积110.29平方公里,其中

城区面积10平方公里。1988年总人口25.92万,其中城镇17.28万。

南充交通,陆运有川鄂、渝南两条国道公路纵横穿越市境,又有18条县乡公路通达省内各地。嘉陵江水运100吨级驳船可上溯广元,300吨货轮常年通航重庆。空运有班机可飞往成都、重庆、达县。既有交通之利,更有丝绸著称于世,历来便是商旅涉足之地,迄今发展成为以丝绸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轻纺工业城市。

第一节 蚕茧、丝绸产销

南充是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具有原料资源、加工能力、技术力量、名特产品四大传统优势。西周时期,南充桑蚕、麻、绸已成贡品。唐宋时期,“农

人平时种田,闲时缫丝织绸”,形成家家养蚕,户户缫丝的局面。民间盛传“天上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的民谣,县内以百户为里,设里正以课

农桑。唐开元中,丝、绸、绫、绢等 10 多种产品被定为朝廷贡品。果州之绫还东渡日本,被日皇室珍藏为国宝。当时,丝绸业虽然繁荣,但大部分产品被充作贡品和折税实物,部分成为商品在市场流通。晚清时,有缫丝织绸厂 20 多家,从事蚕丝、绫罗、绸缎生意的商店达 150 多家。民国初年,在张澜倡导下,南充创办果山蚕业社、实业学校蚕丝班、普通中学蚕丝班,培育专业人才,推进蚕丝业发展。1915 年,何慎之携南充丝绸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头等奖;吉庆丝厂醒狮牌 13/15 扬返丝、泰丰丝厂菊花牌厂丝亦在博览会上分别获头等、四等奖。40 年代,川北各县普遍栽桑养蚕,商贾云集南充建厂。民国 31 年,各种丝绸产量 15.2 万匹(约合 300 万米)。抗战胜利后,由于通货膨胀,加之国民政府杀价统购,蚕桑丝绸业受到严重破坏,年产绸量仅 1.5 万匹(约合 29 万米)。50 年代,人民政府对蚕丝业进行调整扶持,缫丝、织绸、炼染得到综合发展。1959 年产绸量 429.22 万米,比 1949 年增长 13.8 倍。50 年代末到 1978 年的 20 年间,产量不稳,起伏不定。1978 年后,丝绸业开拓发展,产量大幅度上升。1988 年,全地区丝绸厂发展到 56 家,生产丝、绸、绫、罗、缎、纱、纺、绉、绢、葛、锦、绨、毡 13 大类,近 200 个品种,上千个花色。蚕茧产量达 28560 吨,占全省产量 1/4。生丝产量 3420

吨,占全省产量 1/4。丝织品产量 3641 万米,占全省产量 1/3,丝绸出口占全省的 50~70%。南充已成为全国四大丝绸生产基地和 15 个丝绸出口基地之一。

南充蚕茧交易素称兴旺。民国 11 年,新城门外和三公庙一带建茧市街,形成了专业桑茧交易市场,年均购茧量(改良茧)1000 余吨,临解放时下降至 69 吨。50 年代大力发展,全区内最高年产量保持在 5000 吨左右。“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徘徊在 7 千~1 万吨。80 年代持续发展,蚕茧流通市场日趋活跃。1988 年,收购量达到 26750 吨,比 1980 年 16718 吨增长 60%。

丝绸内销。唐代,南充丝绸已运销全国。明代,南充为重要丝织品产地,其素绢为书画家所乐用,大绸、丝袜也有名。清代,丝绸已成为市场大宗商品。每年新丝上市时,云南、陕西、成、渝等各地客商携巨资云集南充,城内各街口茶馆皆为丝绸交易场所,鸡市口东南角茶馆是川北最大的丝绸交易市场。捆捆银丝,匹匹帛练,光彩夺目。年销售生丝 3600 市担(每担 100 市斤)、绸 1.75 万匹,销售额 17 万银元。民国初年,蚕桑丝绸亦有较大发展,产品仍畅销全国。民国 25 年 3 月,四川丝业公司成立后,茧、丝、绸的产销则为四川官僚资本所垄断。民国 32 年,国民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全部控制了蚕丝业的产销。主要销地为东北、

华北和中南各省。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蚕丝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扶持其生产发展,产绸量迅速增加。南充百货公司组织购销,50~60年代购销量在100~200万米,70年代高达600万米,销往省内外20多个地区。1983年后,南充地区茧丝绸公司和南充丝绸批发站相继成立,统管原料和成品的产、供、销,生丝、绸缎除调销省内外,并组织出口。

丝调外销。汉代以前,南充丝绸出口主要通过成都分两路出川。一路经邛崃、芦山、荥经、汉源、冕宁、西昌、德昌、会理入云南;另一路经乐山、宜宾入云南,然后沿“南方丝绸之路”,分别经大理、腾冲等地入缅甸、印度,再转销东南亚各国。唐宋时,果州之绫、生丝及其制品,经长安,汉口等地出口日

本、南洋各国。清末,重庆丝商在南充设庄收购大车丝,经上海转销印度及南洋各国。民国26年,南充丝绸多由宜宾、昆明销往缅甸,或由上海销往日本及欧美各国。此后,丝绸外销以重庆为转口点,经西南、西北方向转销西亚、东南亚各国。解放后,主要由重庆、昆明、上海转销缅甸、越南、印度、苏联及西欧的英、法、比、瑞等国。1960年5月,南充绸厂、阆中丝厂及南充第二、第三制丝厂划为出口厂。是年,南充丝织品大量外销,以上海、广州为转口点,全地区外销量达351万米,占全省91.17%。1985年,通过上海出口生丝1492吨,丝织品592万米,总值达10034.6万元。1988年,出口厂扩大到19家,出口绸缎892.2万米,生丝597吨,总值达20775万元。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解放前,川北的主要农副土特产品多集运于南充,以此为转运枢纽。向外运销的主要商品有桐油、猪鬃、肠衣、生猪、柑桔、药材、菜油、棉花、山货、牛羊皮等。行畅最旺时期,市场流动资金保持在50万两白银。新中国成立后,运销逐步由国营公司所取代。

桐油。民国年间,除丝绸外,桐油产销量最大。民国25年,南充产桐油2.64万市担(每担100市斤)。西充、

营山、南部、阆中、苍溪、蓬安、广元、昭化、剑阁、通江、南江、巴中等县的桐油均在南充集散,转至重庆出口。年输出量超过3万市担,占重庆出口量的60%。南充桐油质量颇佳,曾获民国25年加拿大油脂大赛特等奖。民国26年以后,长江下游水运阻塞,运销渠道经重庆取道贵阳、昆明转销于泰国、缅甸及欧美各国。50年代以后,产销由旺转滞。1957年产量高达15万市担,

1977 年降至 9.13 万市担。1980 年以后,桐油在国际市场销售不畅,1985 年仅输出 3000 吨(6 万市担)左右。

猪鬃。南充历来是生鬃集散市场,仅次于重庆。生鬃来源,除南充所属各场镇外,广元、剑阁和青海、陕西、甘肃均有生鬃运来。南充有洗房 13 家加工熟鬃,年产著名虎牌渝鬃 3000 余市担(每担 100 市斤)。民国初年始有出口,行销英、美、苏、意、日、澳,尤以苏、美销量最大。50 年代初,南充定为猪鬃生产基地,除川北各县生鬃集中南充销售外,甘肃和陕西的汉中、安康也有生鬃运来南充集散。5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因集散区域缩小,运销量逐步萎缩,外贸机构组织收购生鬃加工熟鬃,运往成都出口,由最高 4700 箱(每箱 100 市斤),到 1980 年减少为 2160 箱,1988 年仅有 1462 箱。

肠衣。其交易始于民国初年。川北各县肠衣商收购肠衣或制成胚肠,集运南充,经过加工整理,集中转运重庆销售,出口法、意、德等国。50 年代初,南充实行肠衣统运,由畜产品加工厂和肠衣社收购加工。60 年代年输出量保持在 20 万根。随着生猪发展,收购量增大,肠衣统运成都出口。1980 年出口 148 万根,1988 年稳定在 138 万根。

生猪。南充农村普遍以养猪为主要家庭副业,出栏生猪有 2/3 由屠商组织运销。民国 12 年,南充有屠商百

余户,收购南充邻近县的生猪,除就地宰杀鲜销外,还将活猪运往重庆销售,每年冬季则加工腌腊肉销往重庆等地。50 年代,由贸易公司、食品公司组织加工腌腊肉,每年销往陕西、甘肃和省内森林工业地区达 100 余万市斤。1959 年,南充冷冻厂、罐头厂相继建成投产,集运南充冷冻厂宰杀的生猪每年有 5~8 万头,加工的冻猪肉除供应罐头厂制罐原料外,还调往重庆。1960 年,南充冻猪白条肉开始出口苏联。70 年代后期,南充各县普遍修建冷冻库,生猪产销更趋兴旺,冻猪肉大量销往省外。1988 年,全地区出栏生猪达 577.65 万头,占全省总出栏量的 1/10;食品公司收购 200.62 万头,占全省总收购量的 1/9;调出省内外 160 万头,占各地市调省总量的 1/6;出口冻猪分割肉 1200 吨,占全省出口总量的 1/10。

柑桔。南充是四川四大柑桔产区之一。南充市郊盛产柑桔等水果,故称“果城”,唐代因此置果州,并设官管理果木。后随朝代变迁,生产衰落。民国 27 年产量 718 万市斤,民国 35 年降至 360 万市斤。50 年代开始,政府扶持,大力发展,1958 年产量恢复到 1000 万市斤,至 1978 年的 20 年间,年产量保持在 2000~3000 万市斤。80 年代以后,年产量增至 10 万吨(2 亿市斤)。著名品种南充窖藏广柑,畅销武汉、北京、天津、上海和省内重庆、成

都等地,每年夏季畅销于国际市场,2702吨。1980年出口2007吨,1988年增至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解放前,南充是川北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市场,又是重庆出口商品供货基地。1949年,南充工农业总产值仅1109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911万元。解放后,南充利用川北地区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资源,发展以丝绸工业为重点,同时开发石油、食品、针棉织品、汽车配件、机械等工业。改革开放以来,相继组成丝绸、棉纺织、轻工等行业集团企业,产品向外开拓,商品流通更趋活跃。石油成品油、石蜡、纺织机、针棉织品、自行车、汽车配件等,畅销省内外。生丝、绸缎、40^S×40^S纯棉纱府绸、天歌羽绒系列产品和食品罐头,长期畅销香港、欧洲、东南亚十余个国家和地区。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6.88亿元,比1978年2.13亿元增长2.2倍,比1949年增长61.06倍。轻纺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兴旺。迄今,市内的模范上、下街、人民南、北、中路、涪江路,已成为商业繁华区,工业品、副食品批发、零售商场,生意兴隆。全市商业服务网点有4563个,农贸综合市场7处,尤以西门小百货批发市场最为兴旺,日

交易额最高达10多万元。

饮食业有1100余家,各种名特小吃饶有地方风味。顺庆冬菜是四川十大腌菜之一,脆嫩油润,味醇香浓,为著名川菜菜肴佐料,至今已有百年历史。顺庆卤鸭子乃四川卤味上品,1957年荣获省卤制品第一名。川北凉粉色泽红亮,柔软、绵实、滑嫩、香辣爽口,独具乡村风味。顺庆羊肉粉香辣味浓,细嫩绵实,滑润爽口,且汤汁滚热,寒冬食之,风味倍佳。这两个名小吃享誉全川,名扬京津,1988年列为省的名特小吃。

1988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98亿元,比1978年6924万元增长4.75倍,比1949年增长42.72倍。“八五”计划期间,随着穿越南充市境的达(县)成(都)铁路、高坪飞机场(可起降大型客机)的修建,和丝绸、粮食等大型专业市场的建成,以及每年一届的中国·四川·南充丝绸节商品交易会的召开,南充市将是交通方便,交往扩大,流通活跃,更加繁荣兴旺的丝绸名城。

第十三章 川中物资集散地——遂宁市场

遂宁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东邻南充、重庆,南接内江,西连成都、德阳,北靠绵阳,历为川中物资集散地。

遂宁设县较早,蜀汉时置德阳县。东晋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设遂宁郡,历为郡、州、府、县治所。民国时期,为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1950 年设遂宁专员公署,辖 9 县。1958 年,并入绵阳专区。1985 年,撤销遂宁县,建立省辖遂宁市,辖市中区和

射洪、蓬溪两县。总面积 5300 平方公里,总人口 337.8 万。

遂宁扼涪江水路咽喉,处川中陆路要冲。溯江而上,可至射洪、三台、绵阳;沿江而下,能达潼南、合川、重庆。明代,筑有通往附近各州县的驿道。民国 26 年后,绵渝、川鄂公路交汇于此,可直达成都、重庆、南充、绵阳。解放后,境内建有通接各县、区、乡的公路网络。

第一节 纺织品产销

植棉、纺织是遂宁的传统产业,素有“纺织城”之称。早在东晋时期,农户种麻织布,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较为普遍。唐代,生产丝、布,所产樗蒲绫即被列为贡品,丝绢“越罗”居全国第六

位。明清时期,境内农户十之八九种棉,城乡家家有纺车,十之六七为织户,大街小巷机杼之声不绝于耳。清末,纺织工场规模大者上百人,小则数十人。光绪年间,遂宁商家已形成土

布、匹头、洋纱等 20 余帮。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县城专业织布户达 200 余家,乡村自纺自织自售者更多。江西、浙江、陕西等大商人也来遂宁采购土布。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浪潮的推动下,地方财政亦拨资兴办缝纫、纺织等综合性工厂,土纺土织产销特别兴旺,年输出土布数量大增,仅“拦江镇之土纱细布贩运成都,岁达数百万匹”。纺织、印染居各业之首。同时,棉花、生丝、棉线、罈网、袜子等产销亦十分兴旺,随同土纱、土布远销成都、重庆、川东、川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

抗战时期,遂宁的棉花种植和纺织生产又得到较大发展,数年间棉花产量占全省的一半。从事加工土纱、家庭纺织的人约占总人口的 1/6。不少商人来遂宁购买土布、土纱、毛巾、袜子、棉线、丝线等运销省内外。民国 29 年(1940 年)农本局福生庄在遂宁设立办事处,以雄厚的资本大量经营棉纱、棉布、袜子、棉花等,并供给纺织品原料,加工土纱、土布、洋布(机纱),加之国民政府为解决军需民用,投资建厂,提倡发展纺织行业,加强技术指导和改革工具等措施,纺织工厂、工场、个体纺织户迅速发展。1939~1945 年间,遂宁县城纺纱、织布工厂先后建有 40 余家,规模较大的有:遂宁纺织染厂、新华纺织有限公司制造厂、军事委员会特许华侨兴华国防工业厂、遂宁

纺织厂、协光、建华、励进、振兴织布厂和遂宁棉纺织推广实业社等 19 家。个体手工纺织户蓬勃发展。1943 年县城有织户 1460 家,织机 3720 台,乡村织户 4500 家。全县布匹产量达 100 多万匹,土布产量居全川第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印染、弹花、缫丝、制线等业的发展。遂宁所染阴丹士林布,耐洗不褪色,远近闻名。抗日战争胜利后,依靠农本局支持生产的纺织厂,多数停业。整个纺织业面临困境,呈现不景气现象。之后,遂宁纺织业利用当地充分的原料、技术、人力等有利因素,组织生产,自产自销,市场转趋活跃。1946 年遂宁土布销成都、重庆、合川、绵阳等地 102 万匹,土纱运销合川、璧山等 20 万斤,运销各地的毛巾、土袜约 18 万打。1948 年后,遂宁纺织业日益萎缩。1949 年遂宁城内有土布业、棉纱业等商号 378 家,摊贩 154 户。

50 年代开始,遂宁先后兴建棉纺织厂、针织一、二厂、棉花加工厂、丝绢厂等一批纺织企业,成立中国花纱布公司川北公司遂宁分公司和四川省百货公司重庆纺织站遂宁分站,支持遂宁纺织工业的发展,收购纺织品供应附近各县和调销省外。1988 年,全市有纺织企业 70 个,产值 3.45 亿元,占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34%,主要品种产量居全省同行业第三位,生产纱 14608 吨、布 10041 万米、印染布 3903 万米、床单 49.33 万床、丝 822

吨、丝织品 268 万米、棉毛衫裤、汗衫背心 556 万件。纺织品品种 200 多个, 销上海、云南等 10 余省市和省内 60

多个市县, 还有 20 余个品种跻身国际市场, 纺织业出口产品产值 5468 万元 (1980 年不变价), 占总产值的 16%。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遂宁地处涪江流域, 沿江物产富饶, 盛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等。邻近不通水路的安岳、乐至等县的进出口物资, 均须经遂宁装载起运, 遂宁历来为川中的物资集散地。输出的农副产品以粮食、猪肉、植物油等为大宗。

粮食。民国时期, 每年输出大米 5600 吨, 销射洪、蓬溪等地; 高粱 3500 吨, 销铜梁、合川等地; 大豆、玉米 2800 吨, 销三台、射洪等地。解放后, 由国营粮食公司统一经营, 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调出。

生猪。遂宁为四川生猪主产区之一, 每年有大量肥猪外销。民国时期, 主销重庆。解放后, 实行计划调拨, 外调活猪及猪肉制品, 供应大城市、部队。1988 年生猪存栏 206 万头, 出肥 174.5 万头, 调出活猪 34.14 万头, 猪肉制品 1.5 万吨。

食用植物油。菜籽油、芝麻油、花生油为遂宁的传统大宗输出产品。民国时期, 常年输出 200 万市斤, 主销重庆、上海。解放后, 实行计划调拨, 主调

重庆。50~70 年代, 每年调出 100 万至 250 万市斤, 以菜籽油为主。1978 年后, 菜油产量和输出量大幅度上升。1988 年全市产量达 6420 万市斤, 销重庆、陕西、河北等地 5000 万市斤。

遂宁传统输出产品还有猪鬃、猪肠衣、生丝、海椒、白芷等。

输入和通过遂宁中转的农副产品, 以纺织原料、油饼、大米、大豆为大宗。民国时期, 年输入棉花 3000 吨、棉纱 300 吨, 货源来自蓬溪、射洪、三台等县; 油饼 5000 吨, 由合川县、广安县和渠县的三汇镇运入; 大豆 2800 吨, 来自合川、广安、重庆; 大米 7000 吨, 来自江油县、潼南县。这些商品, 除在遂宁销售一部分外, 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璧山、重庆等地。解放后, 粮食、棉花等均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调拨, 不再通过遂宁中转。随着遂宁纺织工业的发展, 调入棉花的数量比解放前有很大增长。50~60 年代为 2000~6000 吨, 70 年代 5000~8000 吨, 80 年代 8000~9000 吨。

第三节 工业品购销

解放前,遂宁除纺织工业外,制糖、酿酒等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他工业比较落后,大部分日用工业品要靠调入。50年代开始,纺织、食品工业进一步发展,化工、机械、建材等工业相继建立。198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3.74亿元,其中轻工产值占78.4%,食品、饮料制造业产值4.05亿元。

食糖。遂宁蔗糖生产历史悠久,唐代已大量种植甘蔗。据宋代王灼著《糖霜谱》载,遂宁是我国冰糖(古称糖霜或糖冰)主要生产地之一。唐代遂宁伞山前后糖霜户占十之三四。北宋时,遂宁糖霜列为贡品。南宋时,遂宁冰糖年外销数千市斤。50年代,冰糖产量逐步扩大,1980年以后年产百余吨,销省内外。红糖为遂宁大宗传统产品,清末和民国时期年产量均在100万市斤以上。1958年后逐渐改用机榨制糖,有糖厂、糖坊20余家,最高年产320万市斤,销本县和附近地区。1983年始产白糖,年产4000多吨,主要供应本地。

猪肉制品。1978年以前,调出以活猪为主,次为腌腊制品;1978年后

陆续兴建肉联厂,白条肉、分割肉等加工品种逐渐增至20余个。1988年,加工内外销分割肉、白条肉、火腿等猪肉制品1.5万吨,销省内外和出口港澳、东南亚、东欧等地。市肉联厂年产值2500万元。

酒。唐代,射洪、遂宁所产酒已负盛名,诗圣杜甫有“射洪春酒寒仍绿”的诗句。民国时期,有酿酒作坊200多家,均产高粱白酒,销本地和附近县。1941年,射洪县柳树沱始产大曲酒,因地命名,称为沱牌曲酒。50年代开始,酒类生产迅速发展,质量提高,规模越来越大。1988年产酒5.78万吨,其中曲酒1.23万吨。以射洪沱牌曲酒厂的沱牌曲酒、遂宁市遂州曲酒厂的遂州头曲、蓬溪县酒厂的芝溪玉液最有名。沱牌曲酒具有窖香浓郁、清冽甘爽、绵软醇厚、尾净余长,尤以甜净著称的风格。1988年在全国第五届白酒评选中,沱牌54°、38°曲酒获国家质量金奖和中国名酒称号。沱牌曲酒厂1988年产酒4.28万吨,其中曲酒9500吨,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销售网点500多个。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遂宁商业历史悠久,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遂州商税收入居全省州城第三位。光绪年间,遂宁商家已形成匹头、棉纱、民船、饮食、旅栈等20余大帮,城内59条街巷摊铺相连,每逢场期、庙会,人流拥挤,交易活跃。遂宁及附近各县物资在遂宁集中经重庆输出,外地货源主要来自重庆。

民国初年,遂宁富商中有“八大家”,主营布匹、洋纱、绸缎、颜料、典当等业务,拥有大量街房和店铺,在成都、重庆、绵阳等地设有分号,批发业务遍及十余县。

抗战爆发,遂宁北上陕甘,南下重庆,成为转运战略物资的中间站。国民政府驻遂宁的中央直属单位、省级单位和陆空军单位达39个,中央、省级金融机构及私营银行增至14家。遂宁市场空前繁荣,店铺密布大街小巷,集市遍及四门。北门旌忠庙棉花市场终日人头攒动,南门米市昼夜人流不断,天上街布市货物堆积如山。遂宁城沿江四里,旺季靠岸船只六七百艘,淡季四五百艘,大者百吨以上。白天,江中船只上下如织,江边桅杆林立,码头装卸货物往来如梭;入夜,灯火通明。骡马行、车行、力行分布斗城东南西北四门内外,计有脚店20余家,每天至内

江、成都的骡马200余头,脚夫千余人。

遂宁城郊有隋开皇年间所建灵泉寺和唐开元年间敕命建广德寺,建筑群雄伟壮观,闻名遐迩,历代香火旺盛。每年农历二月为香会节,来自十余省及省内60余县的香客逾百万,多购买拜佛用品和居家用物品。遂宁工商各业行帮不惜巨资组织朝山晋香活动。会前,备好物资,会期,张灯结彩,通宵达旦,将香会节办成川中大型物资交易会。1926年,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驻防遂宁,利用二月香会节举办“劝业会”,令所辖各县运送物资在广德寺展销。1935年,四川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沿袭劝业会,每年举办9县各业产品展销评比会。遂宁庙会期间,每天交易额达数十万银元,部分行帮商号营业额为全年之半。

1948年,遂宁商会下属有34个同业公会,城内有商店2507个,摊贩1803户,以街为市的专业交易市场54个,饼街、海椒街、铁货街、梭子街、盐市街等均因当时市场销售的商品而得名。尚有不少行业以茶馆为批发市场,如张家茶馆为纸市,西门茶馆为白糖市,仁和茶馆为鸦片烟市等。

50年代开始,工业品货源以重庆

为主,由国营公司分配供应附近各县。1958年以后,涪江水运日减,逐渐为公路运输所取代,加之行政区划和商品分配渠道几经变化,遂宁所起四川盆地中部物资集散地作用逐渐缩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生产发展,市场繁荣、活跃。1985年建市后,工农业生产长足发展,城市建设面貌一新,商品流通迅速扩大。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长39.2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5年增长81.96%;商品购进总额15.1亿元,商

品销售总额16.9亿元,市区有商业、饮食服务业2.3万户,其中个体1.6万户。城内设有各类批发市场80个,摊区7个,集贸市场20余个。大街小巷、各街要口,叫卖声、音乐声不绝。各个摊区、摊位相连,数以百计;南北干道、和平路、凯旋路、大东街、天上街、大西街等主要街道,商场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外地商人不少,以附近各县和浙江、广西、广东人居多。随着筹建中的成达铁路建成营运,遂宁将步入川中物资集散鼎盛时期。

第十四章 四川甜城—内江市场

内江市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沱江中游、成渝、内宜铁路交汇处，居水陆交通要冲，历史上以产糖闻名而称“甜城”，是传统的物资集散地。

内江置县始于东汉，名汉安，隋初改名为内江，沿用至今。1950年为专署驻地。1951年9月设专辖市。1985年撤销内江地区，改为省辖市，辖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八县和市中区。总面积13340

平方公里。1988年末，全市人口847.3万；市中区人口32.77万，其中城镇人口21.07万。

内江居成渝两地中间，西通自贡，南接泸州。陆路有成渝、内宜铁路和成渝、内乐（山）、内安（岳）公路与省内各县市连接；水运沿沱江可上溯川西金堂，下达泸州，成为川中南水陆交通枢纽。

第一节 食糖及糖制品运销

内江气候属亚热带，土壤肥沃，适宜于甘蔗栽种，远在北宋初年已产蔗糖。清初引进福建蔗种后，蔗糖生产蓬勃发展。清末民初全县土地面积约半数以上种蔗，有土榨糖房（熬糖清和制红糖）、漏棚（用糖清加工成白糖和桔

糖）二千多个。1933年产糖量曾高达3.92万吨，出现了“五里糖坊、十里漏棚”的繁荣景象。抗战期间，江浙财团的资金和技术进入内江，兴建半机械化的中国炼糖厂、华农糖厂等，以改造土法制糖。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食

糖专卖,设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于内江,管理食糖专卖事宜。抗战胜利后,内江蔗糖生产大幅度下降。50年代初,人民政府大力扶持蔗糖生产,1956年建成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制造、安装的机械化内江糖厂。内江年产糖量由1949年的1.12万吨上升为1957年的3.78万吨。此后产量屡有起伏,但仍居全川之首。后因粮糖争地,糖、蔗收购价偏低,1985年产糖量仅为1.72万吨,1988年为1.94万吨。

食糖运销。解放前按运销区域分为上、下河帮。上河(沱江上游)帮采购上河各地红糖到内江批售,下河帮则将各种糖运销外地。还按籍贯分为本帮、外帮、贩庄。本帮系本地糖商,在外埠驻有庄客,也可受外地委托代为进货;外帮系重庆、万县等地行商长期住内江进货的商户;贩庄则系邻近县的商户于新糖上市临时来内江设号采购者,常年有200余户,最多时为1937年的353户,最少时为1946年的29户。交易地点有城区南街、大东门茶社、东兴、东坝街交易所及白马、椑木两镇等六处,经纪人常在百人以上。1931年成交量为3.66万吨。食糖的输出:1917年以前为2~2.5万吨,1933年为2.76万吨。主要销往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以及省内嘉陵江、长江沿岸各地。1940年宜昌、沙市沦陷后,输往两湖的食糖大幅度下降,后来转向陕西、甘肃输出部分。1940

年仅输出1.65万吨,1948年降至1万吨。50年代初,食糖仍以市场交易为主,国营、供销、私商都在市场收购。随后,食糖的购、销、调业务逐渐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1953年白糖包销,由国营公司驻厂收购。区乡小机榨糖厂生产的红糖,则由供销社代购。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榨季(以下同)收购食糖2.47万吨,调出2.12万吨。成渝铁路通车后,外调量逐渐增大,1956~1957年收购食糖7.7万吨,调出7.15万吨,分别调上海、新疆、黑龙江、贵州等25个省、市、自治区。之后,外调大量减少。1971~1985年还调入进口糖68.99万吨。1980年取消包销,改按计划收购。1985~1986年收购食糖2.66万吨,调出0.97万吨;1988~1989年收购2万吨,调出0.08万吨。

当地食糖销售。解放前由糖铺(属冰桔业)经营,销售约占食糖产量的20%左右。50年代中期,经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发业务由国营公司掌握,零售则由国营、供销社、公私合营、集体商店经营。1951至1985年内江城乡共销售食糖8.61万吨,占内江同期产量55.11万吨的15.6%。

内江食糖衍生出的制成品有:冰糖、蜜饯、糖果、糕点等。解放前由冰桔业经营,大多是前店后厂,既制又销。民国初年,全城有140余家,其中东坝

街通向河边沿街即达 40 多家。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中说：“内江城里东西街道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重至五六十斤者……。”抗战胜利后，冰桔业随着蔗糖产量减少日益衰落，1946 年只有 40 余家。50 年代初，厂店分开，以国营、合营、集体商店经营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经营网点大量增加。1985 年统计，有国营、集体、个体专、兼营的门市网点 300 余个。

冰糖。民国时期常年产量 800 吨，大部分外销泸州、重庆、宜昌等地。1929 年输出省外 172.7 吨。从 1954 年起，国营公司先后向邻近的资中、资阳县收购冰糖，每年 1000 至 3000 吨。1983 年起，改为代加工。1985 年加工收回 1622 吨，1988 年 2800 吨。大部分调销省内各市、地、州，本地销售约占 20~30%。

蜜饯。生产始于明代后期。最初用升冰糖后的冰水煮熬瓜果而成，故

俗称“煮货”。产量增大以后，改用白糖煮制。解放前，内江有名的商号有铨源、协康等 20 多家，品种四五十个。1938 年，产量 700 吨，运销地区与冰糖相同。50 年代中期，私营商户、人员分别纳入国营、公私合营糖果厂。1988 年有 6 家厂生产蜜饯，加上 1984 年面市的新产品低糖蜜脯，花色品种已达 100 余个，其中 30 个品种获部、省、厅、市级优质产品称号。年产量达 2000 多吨。国营内江市食品厂生产的樱桃、天冬、金钱桔、寿星桔最著名。内江蜜饯除销售省内各地外，还远销省外和港澳地区，并出口日本和苏联等国，驰名中外。1958~1985 年共出口 925.6 吨。

糖果、糕点。解放前均系手工生产，产量较小，仅销本地及邻县。解放后，国营糖果厂先后安装了饼干机、包糖机等设备，产量逐年增加。市食品厂 1952 年产 60 吨，1985 年增至 1000 吨，1988 年又略有增加。产品主要销省内部分县、镇。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清代、民国时期，沿沱江各地的粮、油、烟、药材、棉花、桐油、猪鬃、山货等农副土特产品运来内江市场出售，并集中转运外地。大宗商品是行帮交易，以茶社为交易场所；小批量商品

除商铺销售外，并划定区域进行市场交易。城区有粮食、油料、棉、纱、土布、蔬菜、肉、禽、蛋等 20 多个交易市场。内江耕地植蔗多，粮食不能自给，需外地供应，粮商随之增多。抗战时期内江

定为全川 26 个粮食生产运销及消费市场之一，“第二民食供应处”(全川设四个)设此。米粮从金堂县赵镇、荣昌县吴家铺以及城郊四乡运来，除本地销售外，主要输往自贡、富顺、隆昌等地。1942 年，输入粮食 2.78 万吨，输出 1.19 万吨。1943 年，粮食贩运商和座商达 322 户。50 年代初，粮食仍是市场交易。1951 年，从荣昌、大足、安岳输入粮食 0.08 万吨，输出 0.01 万吨。1953 年，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市场关闭，由粮食部门统一调配。1953 年，调入 1.19 万吨，调出 0.22 万吨。1958 年，调入粮食 5.43 万吨，调出 0.28 万吨。菜油大都从新都、金堂等地运来，1941 年输入 0.05 万吨，销本地与邻近各县。解放后，仍需从外地调入部分。

内江输出的传统土特产品有大头菜、冬尖和酱菜等。内江大头菜是四川四大腌菜(即：涪陵榨菜、宜宾芽菜、资中冬菜、内江大头菜)之一。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达 300 吨。销成、渝、汉口、上海等地。1936 年输出 60 吨(两千坛)，解放后大头菜几经起落，1966 年收购 400 吨，调出 200 吨；1970 年收购 2200 吨，调出 1700 吨。主要销往成、渝、达县等地和省外市场。50 年代

有少量出口。1976 年后，榨菜逐步代替大头菜。1983 年产榨菜 4800 吨，销往湖北、江苏、内蒙等 21 个省、市和地区。由于质次滞销，生产锐减。1988 年生产 700 吨，仅供本地销售。新增的输出商品有：甘桔，供销社 1954 年购进 200 吨，1988 年购进 700 吨，调出省外 100 吨。黄麻，供销社 1952 年收购 3 吨，1988 年收购 4500 吨，调出 200 吨。

生猪，是内江的传统养殖业，“内江种猪”，驰名省内外。(1981 年，国家标准总局批准内江猪选育标准为中国标准)。全国先后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引进了内江猪种。糖业发展后，糖房用糖泡作饲料，出槽量大增。民国时期，运销商大多将生猪水运泸州、江津、重庆等地销售。有时自贡地区也在内江凌家场、白马庙采购生猪。1956 年国营食品公司成立后，组织生猪经营，当年购进 2.99 万头，调出 0.21 万头。1973 年，内江肉联厂建成，附近各县生猪集中到内江宰杀、冷藏，然后调出。1988 年，购进生猪 47.5 万头，调出(包括冻肉)33.18 万头，除调成、渝、京、津、沪、云、贵、两广、黑龙江等 20 余省、市、自治区外，冻猪分割肉还出口苏联和东南亚国家。

第三节 工业品购销

解放前,百货、布匹、瓷器、西药、煤油、棉纱、香烟等工业品,大部分从省外经重庆、泸州运进,少量则由成都运进。解放以后,地方工业生产有很大发展,有些商品除供应本市外,还销往省内外市场。

解放前,内江输出的地产品有夏布、酒和酒精以及镜子、棉袜等手工业小商品。木机制的夏布,1926年成交量达20余万匹,大部分运销外地,并出口朝鲜等国。1942年,有木、铁机小织布厂23家,年产土布21890匹,销本县及附近各县。1958年机械化的内江棉纺厂投产。1988年产布7227万米,商业收购3221万米,调出685万米,出口1088万米。

制糖副产物—废糖蜜(又称漏水),能酿酒。民国初年,椑木镇沿江即有68家制作糟房,全县月产量500吨以上,大部分水运成都一带销售。抗日战争时期,糖蜜成为生产酒精的主要原料。1940年,内江有酒精厂32家,月产量达2100吨以上,内江成为酒精生产中心之一。50年代后,糖厂继续用糖蜜制酒精。1988年生产1200吨,大部分调出作工业、医药用。糖厂还生产代用品酒类,品种有白酒、劳动酒(困难时期制造)、山楂酒、杨梅酒等。

1980~1982年产2万多吨。大部分销往外地。1988年,内江产各种饮料酒3.71万吨,本地零售仅0.45万吨,其余部分经过商业部门及厂方销往省内外。

1958年以前,内江用纸全从外地调入。1958年后,糖厂陆续用蔗渣造纸。1988年,产量达到2.42万吨,商业收购0.85万吨,调出0.07万吨,出口0.03万吨。大部分由厂方自销。

1978年以后,内江的食品加工业有很大发展,仅肉类、粮食加工、饮料制造等产值1988年即达3.1亿元,在各类产品中占第一位。机械、纺织等工业发展亦快,以前仰赖外地调入为主的针织品、丝制品、医疗器械、锻压设备、机床、皮革制品、药品等几十种产品均有一定数量的输出。1988年,生产棉毛衫裤44万件、皮鞋11.4万双、麻袋478万条、化工设备544吨、变压器23万千瓦安、锻压机械1619台、内燃机20万千瓦、造纸机械185台、X光机525台、药品5063吨,调销省内外市场。其中X光机是全省唯一产品。

内江还是大宗商品的中转地,外地及本地商业、供销、物资、厂矿单位在内江设立转运站多达30多个。中转

物资有煤炭、石油、酒类、药材、粮食、副食品、日用工业品、小食品等。安岳县南部五个区所需的工业品、食糖类及原材料大多经由内江转运；调出的生猪、粮食等亦经内江转运各地。富顺、泸州、古蔺等县、市的酒，叙永、荣县的中药材也通过内江转运省外。煤

炭、石油大宗商品调入内江后，再转运邻近县和工矿企业。石油产品在50年代还中转至贵州毕节、泸州、自贡、富顺等市、县。1988年，仅商业系统转运的物资就达84万吨，其中煤炭、石油占一半以上。

第四节 市场发展变化

清代、民国时期，食糖及糖制品是内江市场上交换的主要商品。50年代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内江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品种、数量、流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食糖和糖制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粮食、油料、生猪、棉花等农副业产品大幅度增长。1988年，全市农业总产值24.7亿元，主要产品产量：粮食336.2万吨，棉花2.7万吨，油料18.2万吨，甘蔗72.8万吨，肉类38万吨，肥猪出栏501万头，创历史最好水平。内江市的猪肉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区，并出口国外。销往省外和国外的产品还有蜜饯、甘桔等。

解放前，内江市除食糖和糖制品外，只生产一些手工业品，如夏布、棉袜、镜子等，大部分日用工业品需要从市外、省外调入。解放后，经过近40年的努力，已形成以食品、轻工、纺织、机械等行业为主的工业城市。1988年，

工业总产值36亿元（其中市中区的工业总产值为8.2亿元，比1951年的0.09亿元增长90倍）。主要产品产量：食糖5.2万吨，纱11848吨，布8359万米。棉织品、针织品、丝制品、皮革制品、医疗器械等几十种产品，均有一定数量销往市外。

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运输条件大为改善，经过内江集散、中转的物资数量扩大。民国时期，主要靠木船、汽车、人力车运输。1949年内江有木船2160只，16640吨，吨位最大的为100吨，最小的只有0.5吨。50年代后，主要靠铁路、公路运输，水运量也有增长。1988年，铁路货运量185.7万吨，公路货运量由1952年的1.46万吨增至98万吨，水路运量由1952年的18万吨增至42万吨。

流通领域已由单一渠道变成多渠道经营。商业的户数、人数都有很大增长，据市中区统计，1950至1988年，

社会商业户数由 3066 户增至 5418 户,从业人员由 3073 人增至 14798 人。饮食服务业由 624 户增至 2502 户,从业人员由 1608 人增至 6058 人。发展了跨行业、跨地区工商、商商联营。出现了毛线、小百货、蔬菜等专业

市场。服装摊贩鳞次栉比。国营百货、糖酒等站、司,每年召开供货会,应邀参加的省外企业常有上百个单位。1988 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 29.6 亿元。

第十五章 四川盐都—自贡市场

自贡是自流井与贡井的合称,地处川南腹地、沱江支流釜溪河畔。以“千年盐都”和“恐龙之乡”闻名中外,是全省的重要盐化工业基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自贡自古盛产井盐,因盐成市。自贡盐场长期分属富顺县和荣县,清代称富荣两场,盐业空前兴盛,两盐场迫切要求政令统一。辛亥革命以后,建市呼声不断。1938年,为保障盐税的征收,国民政府批准建置省辖市。市区包括自流井、贡井、大坎堡三镇,面积161平方公里,人口19.8万。解放后,一直为省辖市。由于新盐矿的发现,盐业生产场地向外扩展,自贡市的辖区面积逐步扩大。截至1988年底,辖荣县、富顺两县和自流井、大安、贡井、沿滩四区,面积4373平方公里,人口291万,其中市区面积813平方公里,城市人口50万。

自贡交通方便。水路,由釜溪河顺流而下,可进入沱江、长江。陆路,有内宜铁路穿境而过,有公路通周围各县、市。

自贡城市伴随盐业而产生和发展。由于井市相联,井灶分散,市街也分散。街道以自流井为中心,东西长达20余公里,断续不相联接。古市繁华,以后遭到多次战乱,城市残破。清乾隆时,盐场复苏。清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阻塞,两湖淡食,川盐济楚,产运销市场盛极一时,工商人口增至二三十万。年产食盐20~30万吨。民初军阀割据,关卡林立,食盐销路受阻,市场不景气。抗日战争时期,川盐第二次济楚,市场再度兴旺,座商达3000余家。解放前夕,市场萧条。解放后,盐业和其他工业日益发展,市场欣欣向荣。80年代,改革开放,市场更加繁荣活跃。

第一节 食盐运销

自贡产盐始于东汉,历代不衰。清代鼎盛期和抗战期间,盐的年产量在20~30万吨左右。1949年降至12万吨。1959年达到50万吨。1988年达到133万吨,占全省盐产量的66%。井盐一直是自贡市场输出的最大宗商品。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农民“喂鸡换油盐,喂猪换衣衫”。盐和布是交换农副产品的主要商品,也是四川向省外换回棉纱、棉布的重要物资。晚清时期,井盐年销湖北、湖南等地约5万吨,值银数百万两。

盐税是历代官府的重要财源,涉及多方利益,因此对生产、运销过程控制极严,长期实行“分场分岸,以销定产”的制度,严禁越境侵销。清光绪以前,井盐实行专商引岸制度,销区有计岸(本省销区)、边岸(贵州省大部分州县和云南省接近四川的部分州县),以及湖北与川省接壤的楚计岸(8州

县)。计岸多行陆引,边岸多行水引(水运)。咸丰三年以后的十余年间,淮盐受阻,清廷谕令川盐济楚,销区扩大为百余州县。50年代后,楚岸划归淮盐,井盐失去1/4的市场,长期产大于销。80年代末期,全国食盐供应偏紧,井盐复出三峡,南下两广,东出苏杭,远销东北三省。

古代自贡主要靠陆路官道运销食盐,北通资州(今资中县),南达戎城(宜宾),西到嘉定,东至重庆,人挑马驮,沿路不绝。唐代,逐渐开辟水道运盐,自贡利用釜溪河,“分段扎堰,储水行舟”;进入沱江后,入长江,由泸州转运滇东、黔北,由綦江转黔东北;由长江三峡,进入两湖销区。清末,釜溪河下游有盐船2100艘,上游有煤船1650只。抗日战争时期,公路已四通八达。50年代,成渝铁路建成,内宜铁路通车到自贡后,基本上取代了水运。

第二节 盐业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

自贡市区面积小,人口密集,专业化程度高,盐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市外输入,需求量

甚大。清代同光时期,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者已达数千家。

一、生产资料

盐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种类甚多,数量也大。过去靠市场供应,解放后列为保盐物资,由商业专项供应。主要品种有:

煤炭。明清时期是主要煮盐燃料,长期保持斤盐斤煤水平,晚清虽开发出为数可观的天然气井,供气量丰富,但仍有大量井灶使用煤炭作制盐燃料,常年耗用20万吨左右。1952年恢复生产时,市煤建公司销售16万吨。60年代,制盐天然气化后,用煤减少,80年代,金属行业和街道工业兴起,每年生产用煤增至50余万吨。60年代以前,煤源八成来自威远县,其次是荣县。60年代后改用珙县煤为主。清末有煤栈100余家,抗日战争时期为73户,解放后由国营煤建公司统一经营。

木材。制作盐场天车、绞车、车房等需用大量木材。天车高者百余米,用木材数百 m^3 ,低者也要几十 m^3 。木材来自四川盆周山区或邻省山区,采购地点为合江、泸州、嘉定等木材集散地。民初,有木材商61家,50年代,由国营和供销商业组织供应。改为统配物资后,由木材公司专营。1985年耗量8万 m^3 ,超过历史水平。

楠竹及竹制品。楠竹是输卤管的天然耐腐材料,主要来自云贵及湘鄂山区。清中叶年需10万余根。盐场耗用竹制品亦多。清末,年需提卤竹绳

5000吨,竹盐包三四百万个,以及滤盐篼、围席等,主要来自宜宾。过去由20余家竹商经营,50年代后由土产公司组织供应。现在多数被金属、塑料制品代替。

五金工具。古盐场使用的金属器具甚多,煎盐圆锅或鑊锅,重者达1吨。盐锅来自江津,温锅来自泸州。凿井、掏井用的铁制工具有数百种,均由专业性铁工厂制造。民国初年,广泛使用蒸汽机吸卤后,经营机车、钢丝绳、电料、油漆等现代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应运而生。抗日战争时期有五金电料行21家。解放后,由五金、金属、机电等公司经营,供应量大为增加。钢材,解放初期年耗二三千吨,1988年达到17.5万吨。

二、生活资料

自贡在清代已发展为四川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多,生活消费量大,主要靠外地商品供应。

粮食。抗日战争时期,有米行15处,粮商418家,年输入粮食约两亿市斤。用作牛饲料的胡豆年需1亿市斤,提纯盐质所用黄豆亦多。生产用粮大于民用粮。解放后,盐场基本不再用畜力作动力,饲料用粮减少。70年代以前,粮食公司年销粮1亿多市斤,近年已超过两亿市斤,主要是供应居民口粮。

肉食。过去靠牛力提卤,一个大井

用牛数十头,小井数头。牛源来自川康、川滇、川黔山区,每年采购和宰杀各约1万头。牛肉价格常为猪肉价格的1/3左右,曾为市民的主要肉食品。机器提卤后,牛肉逐年减少,猪肉销量增多,抗日战争时期年销量已达4万余头。1977年定量供应时,宰猪17万头,产肉6948吨。1988年宰猪74.1万头,产肉3.5万吨,调省内3949吨,调省外1.6万吨,出口662吨,调出总量已超过市内销量。

百货。清末,洋货涌入自贡市场,经营呢绒、绸布、百货、文具等行业十分活跃。抗战时期,有百货行业336

家。其他行业如土产、山货、食品等亦很兴旺。

三、饮食服务业

自贡市的饮食服务业发达。50年代初,有旅栈156家,饮食业526户。60年代后有所减少。1985年,饮食业又增为920户。利用丰富的牛肉货源制作了许多佳肴。火边子牛肉,晚清已扬名省内外。制作方法是将牛肉片薄,在火边微烤而成。其味麻辣干香,嚼之化渣,回味悠长,是佐酒佳肴、馈赠礼品,前清盐商用以赠送各级官员。现采用密封包装,运销更远。

第三节 市场发展变化

自贡盐卤及天然气中含有多种化学元素。解放后,利用原盐、制盐废液及天然气生产硼砂、硼酸、氯化钙、氯化钾、氯化钡、烧碱、纯碱、化肥、氯化碳等多种化工产品。与此同时,还发展了机械、五金、建筑、轻纺、食品、电子等工业,逐步形成以盐化工为基础、机械工业为支柱、拥有多种工业生产行业的中等城市,是四川的重要工业生产基地。1985年,主要的产品产量有:纯碱14万吨,小苏打8603吨,氯化铵14万吨,氯化钡10315吨,铁丝、元钉1.56万吨,电焊条20429吨,马铁管件1008万件,阀门7619吨,钢锯条

3820万支。其他还有氯化碳、氟里昂、炭黑、收录机、铁锹、电筒、玻璃等。这些商品多为部管物资,按计划分配。进入市场流通的一部分,有的销往省内部分地区,有的销往西南、西北各省,还有的销往国外。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33.9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6.07亿元。

由于工农业的发展,流通规模扩大,商业机构相应增多,交易形式灵活多样。自贡民间有举行春节灯会的传统风俗。自贡市又是恐龙之乡,春节灯会逐渐演变为恐龙灯会。1986年的第七届灯会和1987年举办的国际恐龙

灯会,盛况空前,观灯人数分别达到200万和230万人次,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批来宾,有国内29个省市区的群众。灯会期间进行了各种经济技术交流,商贸洽谈,成交金额达5.6

亿元,把灯会文化娱乐活动和商业贸易活动结合起来,灯会变成了从事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形式,繁荣活跃了市场。1988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15.17亿元。

第十六章 西南钢都——攀枝花市场

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与雅砻江汇合处,为60年代中期在荒山野岭中建设起来的西南最大的钢铁城市。

1965年3月建立攀枝花特区,4月定名为渡口市。1978年4月,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先后将云南省的永仁、华坪和四川省的盐边、会理等四县的部分地区划入渡口市区。同年10月,国务院又将凉山州的米易、盐边两县划归渡口市管辖,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7年1月更名为攀枝花市。全市面积7434平方公里,辖东、西城区、仁和区和米易、盐边两县,有36个民族聚居。1988年全市总人口为87.88万,其中城市人口42.58万,占48.5%;工农业总产值19.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7.8亿元,农业总产值

1.3亿元。

建市前,人烟稀少,农事不兴,地瘠民贫,交通艰难,进出物资全靠人背马驮。建市后,交通事业飞速发展,市内与县、区、乡和毗邻地区有公路相连;成昆铁路穿境而过,纵贯南北。1988年,全市通过铁路、公路的货运量1671万吨(其中铁路货运量1466万吨),货物周转量2.7亿吨公里,分别比1970年增长7.6倍和5.3倍。

攀枝花具有富饶的矿藏、水力资源。丰富的钒钛磁铁矿已探明储量达100亿吨,其中钒占全国的64%,钛占全国的93%,均名列世界前茅。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钢、铁产量分别占全国十大钢铁厂产量的第四位和第五位,成为祖国重要的钢铁、钒钛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

第一节 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攀枝花商业是伴随着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城市的建设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建市前,1964年11月,从四川、云南两省抽调商业职工88人,自己动手,用油毛毡、席棚盖商店,包装箱作柜台,因陋就简,逐步建立国营商业。工区设在哪里,商业网点就建在哪里,服务工作就做到哪里。1966至1968年,为适应攀枝花建设需要,又从重庆、成都、绵阳、南充等地抽调一批商业干部陆续到工程建设的集中地区大渡口、兰泥箐、云盘山、弄弄坪、攀枝花等片区组建贸易分店、门市部,综合经营,为工区职工生活服务。至1969年,全市国营商业网点已发展到37个,职工1450人。

1970年7月1日,攀钢出铁,同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翌年出钢,标志着攀枝花钢铁基地一期建设工程已初具规模。为适应城市配套建设和工矿服务需要,1971年11月先在渡口水泥厂试点,次年即在全市各大企业中推行和发展厂办商业企业,即由工矿企业出场地,商业出资金,纳入商业计划管理和货源分配,企业为全民性质、

职工为集体身份的厂办商管商业和代管、代销、代购店。1973年又发展了属集体性质的“五七”商店。至1977年,全市已有厂办商店287个,其中厂办商管商店41个,代管、代销、代购商店222个,“五七”商店24个,职工2100人,年销售额2500万元。厂办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既解决了工矿企业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又缓解了国营商业网点不足的矛盾。1979年后,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属国营性质的厂办商管和代管、代销、代购商业全部转为厂办集体商业,但仍实行双重领导,工矿企业负责行政管理,业务由商业部门按行业实行归口管理。

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攀枝花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1988年,全市已建立起各类商贸机构6063个,从业人员23323人,拥有固定资产28861万元,其中国营、供销社机构724个,职工9182人。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73569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22891万元。国营与供销社、集体、个体商业企业的经营比重分别为47.4%、34.3%和18.3%。

第二节 职工生活物资供应

攀枝花属特重工业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大,就业人口多,消费水平高,做好主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供应是国营商业的首要任务。1965年建市之初,商品供应靠全国各地支援。除国家规定的棉布、棉絮和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外,其余商品全部敞开供应。1966年后,由于部分商品货源紧张,对食糖、肥皂、洗衣粉等33种商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1971年,商品货源情况好转,除肉食、白糖、白酒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外,其余商品全部敞开供应。1979年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场商品逐渐增多,国营商业经营的商品全部不再实行凭票供应。但是,大部生活物资仍需由外地调入供应。

副食品。建市前,攀枝花农民无种菜习惯。建市初期,职工蔬菜供应全靠成都市、凉山州和云南省的楚雄、元谋等地组织调入。以后采取厂社挂钩,对口支援,以及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帮助农民提高种菜技术。特别是1975年解决粮菜争地矛盾后,市郊蔬菜生产发展很快,1985年已基本自给。1988年,已建成蔬菜生产基地1.8万亩,同年产蔬菜15.39万吨,上市品种近300个,自给有余。生猪,建市初期的1965年,全市存栏头数仅4.2万

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商品意识增强,1988年存栏生猪已达40.98万头,出栏肥猪20.53万头。牛、羊、家禽等也有较大发展,同年产量分别达到830吨、795吨和5.89万只。其他奶、鱼、蛋的产量和商品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攀枝花市场的副食品供应除蔬菜自给外,其他商品的自给率还很低。1988年国营商业的收购额4107万元,仅占市场需求量的25%,仍有75%的副食品靠省内各地调入。

日用工业品。1966年,国家对渡口市实行“计划单列、专项分配、主渠道供应、优先调运”和向全国一级站直接进货的特殊照顾政策,保证了职工的生活物资供应。为了减少调入,市内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生产。1972年,市内小五金、文化用品、劳保用品等产品的产量均有较大增加,年收购额近800万元。其他大量日用工业品、五金交电化工商品仍需靠省内和全国各地调入。1988年商品调入额达3.3亿元。

饮食服务业。建市之初,饮食服务业附属于各片区国营贸易商店(公司),“石头架锅办餐厅,席棚、帐棚开旅店,大树遮荫理发店,流动照像一人

店”。在环境艰苦,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逐步发展了饮食、服务业网点。1971年4月市饮食服务公司成立,附属各片区国营商店的饮食服务业划归市饮食服务公司后,共有网点34个,职工690个,年营业收入137万元。以后的十多年间,随着攀枝花城市建设的配套发展,市场放开,第三产业蓬勃兴起,全市各种经济成分的饮食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1988年,全市已有饮食服务业网点2764个,从业人员

6374人,其中国营机构75个,从业人员628人。并建成了一批中、高档餐厅、饭店和旅店,年营业收入达800万元。攀花园饭店、渡口饭店利用地方丰富的农副产品木瓜、红芯果、鸡棕菌等资源,做成的攀枝花海参、鸡棕鲍鱼、蜜汁木瓜、木瓜汤元、鸡棕卷粉、攀西凉卷粉等佳肴,地方特色突出,口感细腻,回味悠长,在攀西地区享有一定声誉。

第三节 地方工农业产品产销

建市至60年代末,攀枝花市各行各业集中精力为钢铁会战服务,地方工业除酿酒、糖果糕点加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1972年,在市委、市政府既抓大工业、又抓地方工业,两翼齐飞的思想指导下,以大工业为依托的地方轻工、食品工业得以迅速发展。1973年,攀枝花制钉厂、造漆厂、制鞋厂投产。1975年,年产1500吨的攀枝花啤酒厂破土动工。1978年,攀枝花肉类联合加工厂3000吨冷库投入使用。1980年,以生产炭黑、烧碱的乡办工业投产,填补了市内空白。1982至1987年,地方工业的针纺织厂、经纬编织厂、毛巾厂、塑料制品厂、罐头厂、灯具厂、皮革厂,以及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葡萄酒厂相继竣工投产,进一

步壮大了地方工业门类。1988年,初步形成了以钢铁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冶金、缝纫、皮革、造纸、制酒、酿造、食品罐头、制药、制糖、电子、针纺织等20多个地方工业行业,有企业607个,生产品种上千种,产值55785万元。其中有56个产品已连续多年分别创国优(攀枝花牌11号矿用工字钢1个)、部优(金江牌大桃酥、奶糖等30个)、省优(金竹牌四号皱纹卫生纸等25个)产品。

商办工业是地方工业的骨干企业,1988年已形成酿造、制酒、糖果、糕点、食品罐头加工、冷藏等6大类、500个品种,年产值2500万元的商办工业生产体系。产品主销川滇两省的毗邻地区。

元钉。1988 年产量 843 吨,商业销售 529 吨。

木材。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森林茂盛,是四川的主要林区之一,1988 年采伐木材 20 万 m^3 。每年市产和云南楚雄、丽江等地漂木通过格里坪铁路木材转运站调出,1988 年输出量在 6 万 m^3 以上,主销省内各地和广东、福建等省,是四川木材的重要集散地。

食糖。是四川主产区之一。1988 年产量 1.3 万吨,除市内销售 3000 吨和按计划调省 4000 吨外,还外销食糖 6000 吨。

早市菜。是攀枝花农副产品的一大优势。每年的一、二、三月间,大量上市的青笋、青椒、西红柿、黄瓜等品种,除满足市内供应外,还销往其他地区。1985 至 1988 年,年外销量均在 2 万吨以上。销售的地区主要有华北、华东、东北、西北等 16 个省市区的 32 个县(市)。

此外,1988 年地产的蚕茧 212 吨,苹果 307 吨,柑桔 1047 吨,以及甜叶菊、红腰豆、牛羊皮张、中药材等,销往省内各地和港澳地区。

第四节 川滇边境贸易

建市前,川滇两省边民已有划渡金沙江进行以货易货贸易的习惯。建市后,随着商品交易的扩大,逐步形成了川滇两省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市场。每年省内成都、乐山、内江、凉山和云南楚雄、丽江等市地州县的家禽、鲜蛋、水产品、生猪等农副产品均通过铁路、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攀枝花。1988 年购进量就达 1000 吨以上,购进总额逾 1 亿元。地产轻工、食品产品和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地的日用工业品、糖酒小食品又通过攀枝花各商贸企业,中转销售到云南的楚雄、丽江、保山、大理、临沧、德宏等市地州,促进了两省地区

间的商品流通和余缺调剂。1988 年,攀枝花的商贸企业已与川滇毗邻地区的 72 个县(市)的 1600 多个商贸企业建立了较为固定的购销业务关系,商品辐射面已近 15 万平方公里,2000 万人口,年销售额在 2 亿元以上,其中国营商业商品销售额达 8000 万元。

1978 年以后,攀枝花还利用紧靠云南边贸口岸的优势,借边出海,发展了沿边贸易,但数量极小,品种也只局限于重轨、钛金矿等几个重工业产品。1987 年,攀枝花列为国家对外开放城市,进一步扩大了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的交往,边境贸易也得到较快发展。1988 年出口创汇额达 2000 万元,比

1980年增长4倍。出口产品主要有钢材、钛金矿、钒渣、碳黑、元钉、大输液、砚台、针棉织品等。其中地方轻工产品

出口额为1427万元,占出口总额的71.3%。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并远销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